OXFORD

黃慶雲

我的文化大革命

我的文化大革命

黃慶雲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in

Oxford New York
Auckland Bangkok Buenos Aires Cape Town Chennai
Dar es Salaam Delhi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Kolkata
Kuala Lumpur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Mumbai Nairobi
São Paulo Shanghai Taipei Tokyo Toronto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First published 2006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10 8 6 4 2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t the address below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book in any other binding or cover
and you must impose the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我的文化大革命

黃慶雲

ISBN 0-19-596496-9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份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目 錄

寫在前面 1

1 序 幕

一 序 幕 4
二 還是序幕 7
1. 與大字報有關的 8
2. 三反份子罪行展覽會 13
3. 鬥爭大會 15

2 到幹校去

三 最高指示半夜來 24
四 「忠」的生活 26
五 注銷戶籍 29
六 出發途中 30
七 革命的幹校 31
八 飛來橫禍 33

九　解放幹部的悲喜劇　36
十　一塊肥豬肉　39
十一　種菜的階級性　41
十二　沉默的羔羊　44
十三　祝你生日快樂　46
十四　多情卻似總無情　49
十五　遙憐小兒女　51

3　又搞創作去了！

十六　優詔　58
十七　新的思想境界　60
十八　一把米和百把米　62
十九　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上）　66
二十　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下）　68
二十一《小螺號》　74

4　下放的下放

二十二　下放的下放　78
二十三　群眾運動與運動群眾　80
二十四　劉少奇路線　84

二十五　逆耳之言　88
二十六　鬥爭貧下中農　91
二十七　抓人頭　94
二十八　患難之交（上）　97
二十九　患難之交（下）　100

5　靈魂深處爆發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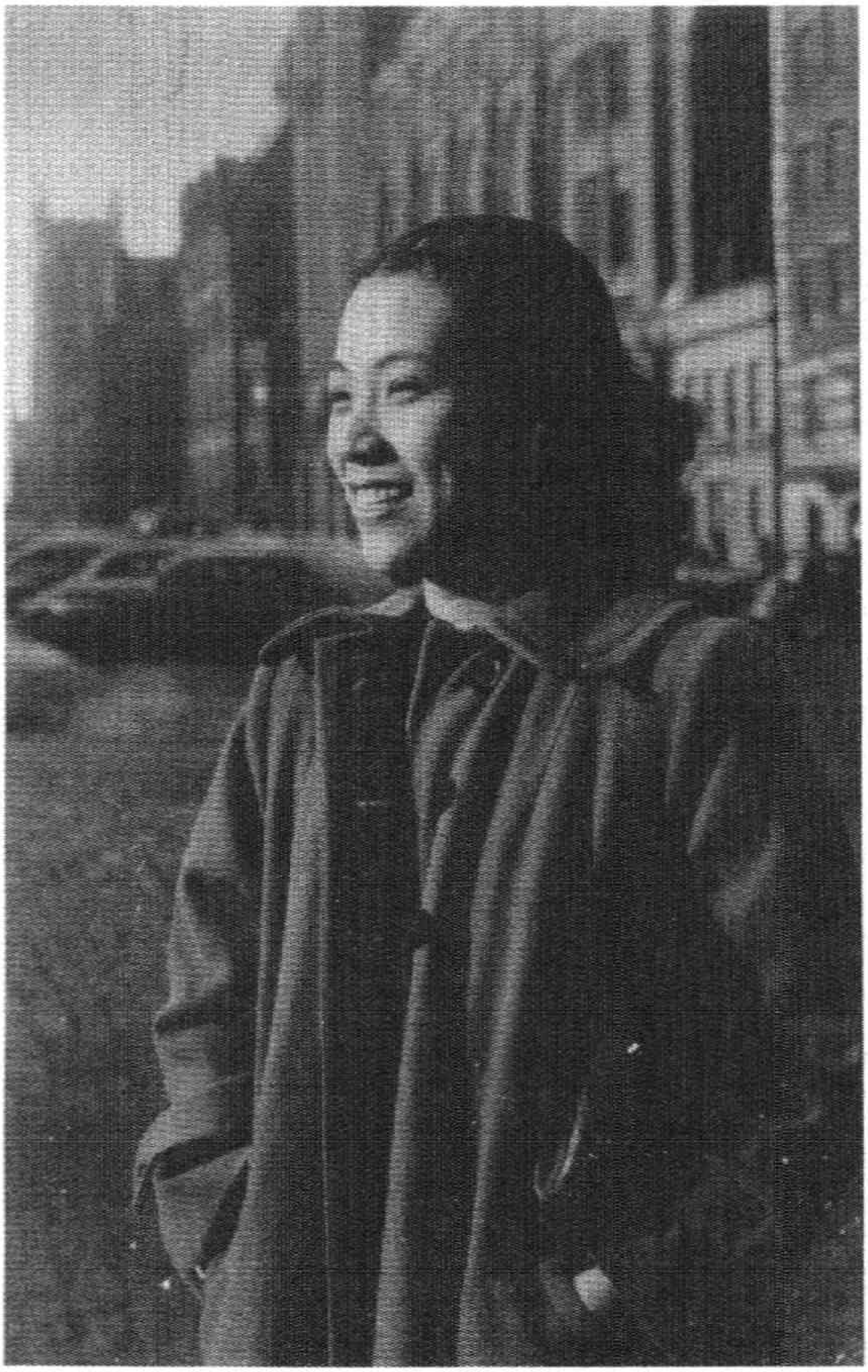
三十　階級鬥爭仍在繼續　106
三十一　「靈魂深處爆發革命」　109
三十二　小洞的故事　113
三十三　我的兒子　115
三十四　神秘的房子　123
三十五　專政迷—尾聲　126

1941年在香港
主編《新兒童半月刊》時

1947年《新兒童》復刊
重返香港時攝

在美國（留學時期）

在華盛頓



在美國街頭

在紐約動物園

在美國

1950年與周鋼鳴結婚

懷抱中的周蜜蜜

曾敏之夫婦，曾夫人章佩瑜也在五七幹校

曾敏之夫婦，曾夫人章佩瑜也在五七幹校

我和郁茹接待日本作家時攝，左二是我，左四是郁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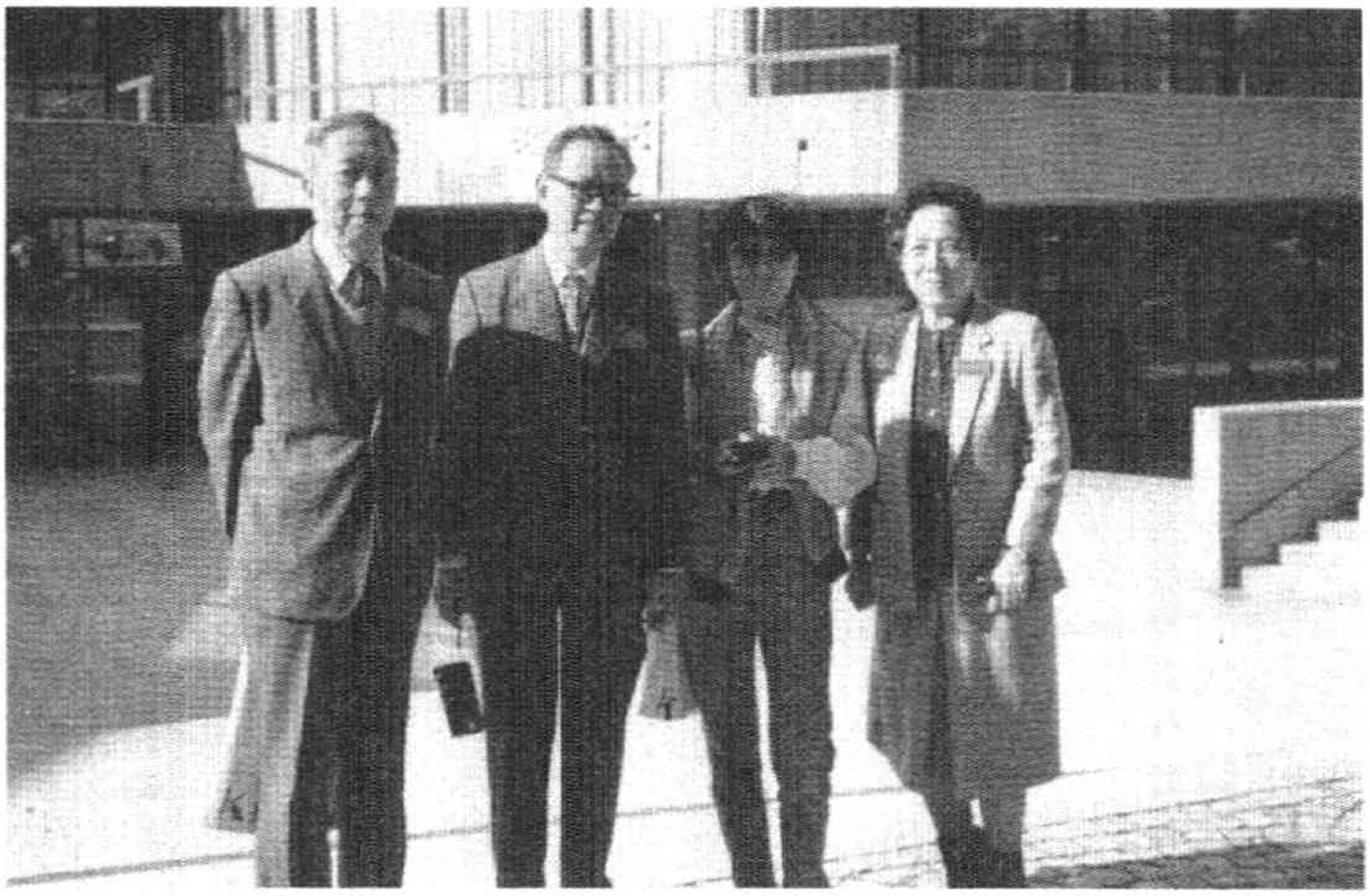
與國內兒童文學家在一起
內有陳伯吹、葉君健、葛翠琳、洪汛濤、任溶溶、何群英等

上圖參加國際筆會在法國，從左到右：杜宣、巴金、朱子範、黃慶雲
下圖1984年在日本東京參加47屆國際筆會從右到左：黃慶雲、李小林、巴金、翻譯陸潔

與冰心大姐、葛翠琳在一起

與何紫在一起

與資深兒童文學家在一起
前排：黃慶雲、陳伯吹
後排：周蜜蜜、阿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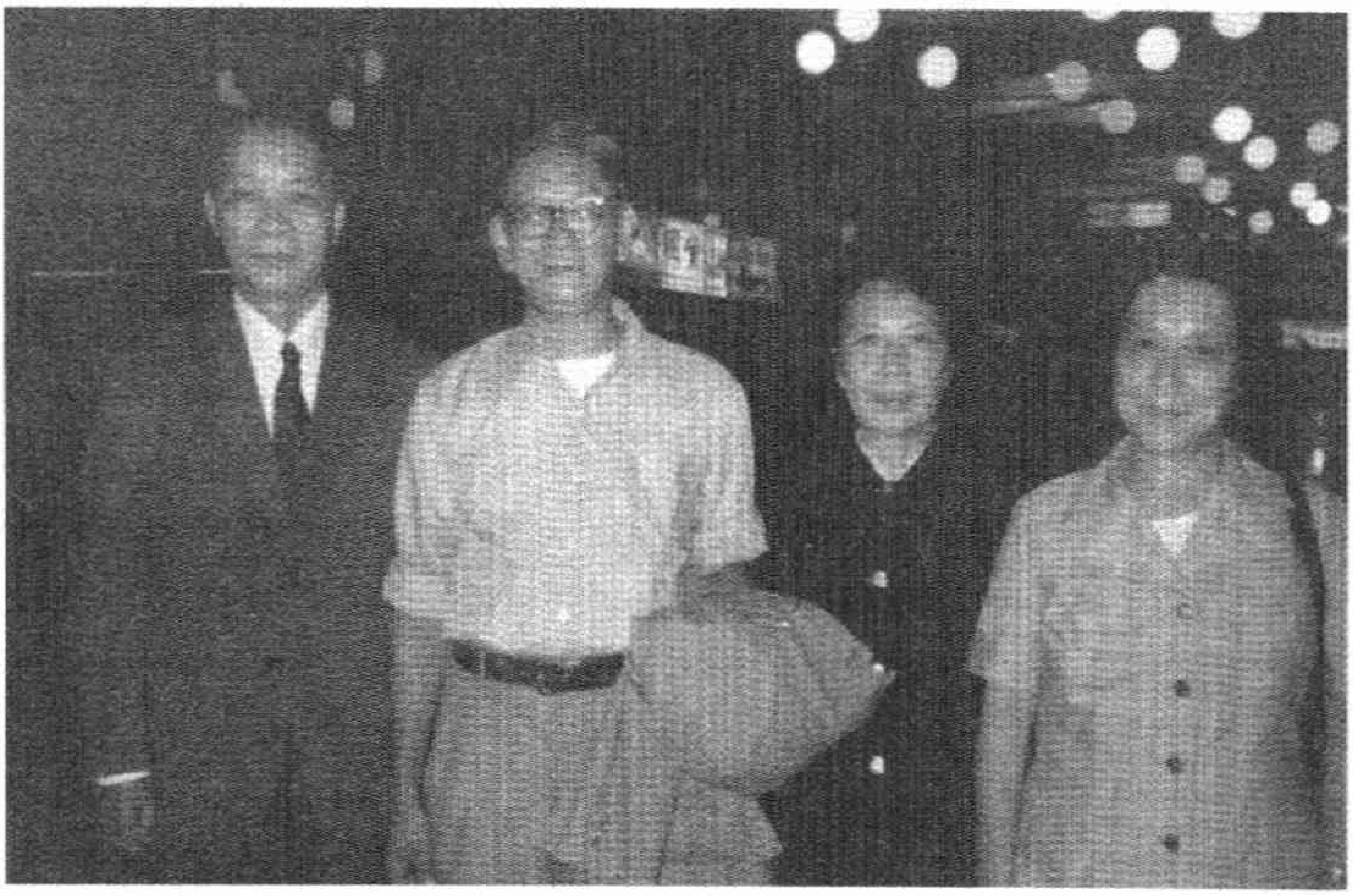


在瑞士參加國際筆會，從左到右：黃秋耘、羅洛、龍應台、黃慶雲

上圖：與日本作家井上靖夫婦遊園
下圖：與周蜜蜜一起在韓國已故兒童文學家小波墓前

上圖：與葉君健訪問墨西哥參觀電影廠猛獸場
下圖：在美國接受訪問，與陸文夫、金堅範、羅洛一起

上圖：在大連的第六屆亞洲兒童文學會上
下圖：在香港作聯歡迎王蒙會上



上圖：與廣東作家協會同志在一起。前排從左到右：饒芃子、秦牧、陳殘雲、樓棲、黃慶雲；後排：岑桑、李士非、容希英、鄭江萍、韋丘
下圖：與陳殘雲、秦牧、紫風應邀到香港。從左到右：殘雲、秦牧、紫風、黃慶雲

與秦牧、紫風應邀到香港講座
從左到右：黃慶雲、羅忼烈、吳紫風、秦牧

在漢城國際兒童文學會上與中、港、台作家合照

上圖：在遼寧一小學校和小學生合照
下圖：在大連與哈薩克兒童文學作家合照

上圖：在香港首屆文學節上與余光中、曾敏之、周蜜蜜合照
下圖：在香港中文大學與宗璞夫婦合照

寫在前面

這本小冊子，是文化大革命中我在五．七幹校近三年的實錄。人生能有幾個「三年」，這長長的三年，就是我把五．七幹校的牢底坐穿的日子。說它是牢，一點也不過份。我生活過的幹校的確是一個監獄，不過，囚犯給撤出去，由我們來接班就是了。我敢告訴大家，這小冊子裏說的全是事實。每一個字，甚至每一個標點符號都是真實的。

五．七幹校裏當然有「牛棚」，但我不在牛鬼蛇神之列，僅僅是一個普通學員。可是，這三年裏過的生活可說是前半生的聚焦點。別的學員也許沒有那種經歷。比如說：來幹校的目的是「重新學習」，特別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而我卻被貧下中農教我怎樣去講真話、講假話、或講不真不假的話；作為文藝工作者，創作應該源於生活，高於生活，而我們卻偏偏要在一個假、大、空的高度上炮製生活，如此等等……

當我從內地回到香港之後，我曾經動念把那麼驚心怵目的經歷寫出來，使之不隨時光的消逝而湮沒，於是就匆匆寫下了一個草稿。可是，那時的氣候是不適宜於出版的，因為文化大革命是當時寫作的禁區。

縱然香港沒有禁令，可我怎能冒着回鄉證被沒收的危險！我愛祖國，我不能失去祖國的。

後來，巴金莊嚴地提出了建立一個「中國文化大革命博物館」的建議。我又動念把這本小冊子完成。那時，我卻有許多寫作任務，只好又停下筆來。我想：等那博物館放下了第一塊奠基的石頭時，再完成也不遲吧！

我在等待，可時間卻不等待，年青人可等待夢境成真，而老年人卻等到「真實」也快要變成逝去的夢了。我接觸不少年青人，他們對文化大革命已愈來愈陌生，更遑論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五·七幹校呢？

等待復等待，到現在連文化大革命博物館的建議者巴金也逝世了。他所期待的博物館也許隨風而逝了。我不能等到它放下第一塊石頭那一天，只好將那三年的回憶再講述出來。當人們回顧那一段慘痛的日子時，這些回憶能夠成為細碎的磚瓦，放到人們想念中的博物館裏面，起着凝聚教訓，啟迪反思的一點點的作用，那我就感到滿足了。

2005年12月12日

1 序 幕

一　序幕

一九六六年夏天，我在中國作家協會廣東分會任職專業作家，這時正參加廣州郊區人和鄉的「四清運動」。所謂「四清運動」，亦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以農村基層幹部為對象的整風運動。

運動分階段進行，此時已接近尾聲了。每一運動即將結束之時，往往在工作隊中進行建黨工作，根據各人的表現，看能否符合共產黨員的資格，說是結束，其實是工作隊的關鍵時刻。

我們的工作隊的成員是一些機關幹部和大學生，由廣州軍區領導的。會議相當嚴肅。指導員向全隊介紹了一位作為黨的新鮮血液的標兵，姓李的大學生，號召大家向他看齊，以他為榜樣，在自己身上找差距。他的先進事蹟是這樣的：在春節放假回家十天時，他發現了母親進入癌症晚期，醫生判斷她只有兩、三個月留在人世了。他家住粵西，往返路程已佔去了四天，能與慈母共敘天倫的苦與樂也只有六天的時間罷了。母親要求他向工作隊請假，多聚幾天。李某是學習毛澤東思想積極份子，矛盾當前，政治掛帥。他想，四清工作是群眾的大事，與母親生離死別

是個人的事。個人的利益應當服從群眾的利益。「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的歌詞天天不離口，這正是活學活用的時候了。於是他毅然決定，非但不請假，還提前三天歸隊。憑着這樣崇高的思想境界，使他成為工作隊中被批准入黨的第一人。

說到找差距，我和他的差距大矣！我母親健在香港，她每次來廣州小住，時間多長我都捨不得她離開呢！而且我更不明白李同學為甚麼要提早歸隊，農民何嘗連三天缺我們工作隊都不行？正當其他隊員紛紛提出向李同學學習的時候，我感到不知如何表態。

恰恰在這時，平地一聲雷，窗外響起了一片排山倒海的喊聲。如潮的農民隊伍高舉標語橫額，高喊口號：「打倒三家村！」「打倒鄧拓！」震撼全城。遊行大隊已到門前。指導員就下令我們馬上結束會議，重抖精神，加入這洶湧的怒潮中去。於是，我就輕易地過了這發言關了。

形勢急轉直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洪潮席捲了所有城鄉，衝擊了一切。第二天，我被通知到工作隊隊部，途中，遇上了更大規模的遊行隊伍，橫額上的標語已多了一個「打倒秦牧」了。

指導員問我說：「你是跟秦牧同一個單位的。你

對秦牧的印象是怎樣的？」

在風平浪靜的日子裏，認識秦牧是何等使人羨慕的事！而現在秦牧已落到井裏，向他投下一塊石子又是何等容易的事！我望着指導員那雙期待着與考驗着的眼光，我知道他要我説甚麼，但我又能説甚麼呢？我想了一想，便説：「秦牧這人，名義上入了黨，思想上還沒有入黨，腦子裏還保存着許多資產階級的道德標準的。」（這話其實我聽過一位資深黨員説的。）

指導員望着那些示威群眾，説：「你沒有看見群眾説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嗎？」

我隨着他的眼光，望望遊行的群眾，打着赤腳的年青人，龍龍鍾鍾的老公公、老婆婆，背一個、拖兩個孩子的農民婦女，一個個滿頭大汗，領隊的喊一句口號，他們就舉一次手。萬眾同聲，萬拳齊舉。我便説：「是的，我相信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知道秦牧一定比我還多。」

指導員説：「好吧！你們單位來了公函，要你立即回去參加運動，努力在運動中考驗自己吧！」

他又告訴我：「我們接到通知，在四清運動中吸收入黨的知識份子，一律宣佈無效。」事實上，四清運動不久也提前結束了。

二　還是序幕

一天之後，我回到本單位——廣東作家協會去了。作協不過是兩幢兩三層的洋房。如果把它比為作家的小天地，那麼這時突然出現的大字報便可說是鋪天蓋地，而一切也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了。

作協有一個小小的會議室。作家易鞏常常引用〈弔古戰場文〉中一句話去形容它：「此古戰場也。」下面的話他卻隱去：「常覆三軍，往往鬼哭。」覆三軍當然是常見事。可是鬼卻不敢隨便哭的。打從批判《武訓傳》開始，一切關係十億人民命運的政治運動，差不多都是從文藝界開始的。「批《武訓傳》」、「批俞平伯《紅樓夢研究》」、「批胡風反黨集團」、「反右鬥爭」等等，使文藝界多人戴上了右派帽子或受到更苛刻的懲罰。跟着，又是「反右傾」、「反修正主義」等等。文藝界往往是一石擊起千層浪的中心。波浪就是這樣從點到面，擴大到各行各業去。現在，又是批「三家村」，又是批《海瑞罷官》，又是批秦牧，飛來的石子已擊中了這小小的會議室，大家又得先天下之憂而憂了。

我寫這小冊子是為了記錄在五．七幹校的生活的。五．七幹校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產物，不得不以

文化大革命作為序幕，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也不能不在這裏提一提。因為人腦不是電腦，如果不把記憶的晶片保留下來，往事就會如煙霧地消失的。

以下就是我要保留的幾個晶片。

1. 與大字報有關的

大字報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據說文化大革命是由一張大字報開始的。寫這張大字報的人立下了大功也犯下了大罪。偉大的領袖也曾親自寫過大字報。在文革中修改的憲法也把戰功彪炳的大字報作為人民的權利列入國家的大法裏。在文革中，人們或而是大字報的犧牲品，或而是從寫大字報鍛煉成才，獲得重任。到現在為止，我仍覺得大字報很難寫。既要掌握大字報的新八股，又要能應用及衍生大字報的語言，這樣才能達到大字報的目的；把蒼蠅變成大象，把香花變成毒草，把對方搞臭、搞死！

吳有恆是作協的副主席，就以某年青作者揭露他的罪狀的大字報作一個例子吧。吳有恆有一首題為〈論交〉的律詩後面的四句：「眼前人物輕豪傑，天下興亡重匹夫。烈士胸懷無暮氣，揮戈敢謂似當

初。」吳有恆是身經百戰的功臣，亦文亦武的壯士。我從大字報看到他這幾句詩，暗裏為之擊節歎賞，這也是我到現在還能記得住的原因。對這樣正義凜然、情文並茂的句子，那位大字報的作者竟然振振有詞的寫道：「眼前豪傑是誰？你是指陶鑄？（注：當時陶鑄還未下台）還是指我們偉大的領袖？你這匹夫竟然如此狗膽包天，想亡共產黨的天下！砸爛你的狗頭！」跟着又說：「你真厚顏無恥，你還沒有死，竟敢以冒死反共的烈士自命！這是甚麼居心！你還想揮戈，你的矛頭分明就是對着共產黨，還有甚麼可抵賴呢？罪證如山，罪該萬死！」云云云云。當時我在旁邊，忍不住說了一句：「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是曹操的詩，烈士未必是死去的。」這位作者橫了我一眼說：「你懂甚麼詩？曹操死了沒有，難道我不清楚嗎？」

《蝦球傳》的作者黃谷柳，每逢運動就有一句名言，這句名言最後就成了他的罪證。雖然要駁倒他的名言是並不容易的。例如在批《武訓傳》時他就說過：「多言多失，少言少失，不言亦失！」在反右鬥爭時，他又說：「今天我坐在這椅子上挨鬥，明天，這椅子又不知要輪到誰坐了！」這些話說的都是事實而且也毫不過火。可是都被上綱上線，成了反黨的罪

證，而且都存在檔案裏。這次，到作協來坐鎮的工作隊規定我們每人都要寫大字報。谷柳又寫了一張，大家都圍着看。他寫的是當年列寧逝世時，給列寧抬棺材的六個同志，除了斯大林之外，所有的都成了叛徒了。我看了不禁為他揑了一把汗。此人越老越天真，能寫幾十萬字的小說而不會寫一張百來字的大字報，不去抓別人的痛腳而把自己的痛腳留給別人來抓。幸而當時他只是一個脫帽右派，用當時的話來說，已是一隻死老虎，能量不大，不是當前運動矛頭所指了，否則後果真不堪設想！谷柳一生坎坷，天才埋沒，現在回憶他的大字報，何等語重心長啊！

《金沙洲》的作者于逢，在文革運動開始時，便憂心忡忡的說：「我真不知該怎麼辦。看來，歷史的題材是不能寫了，寫皇帝好的就是『為帝王將相塗脂抹粉』；寫皇帝不好的就是『罵皇帝』。」他說這話時，T同志在旁邊捅了我一下，悄悄說：「記住，這是寫大字報的好資料。」果然，不久，工作隊就指定我和T同志寫于逢的大字報了。T同志又提起了于逢這番話，說可指出他的矛頭是指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及意圖破壞文化大革命運動。我反問T說：「你能駁倒他嗎？」T看見我不同意也就不寫。其實，寫大字報是不怕對方反駁的，因為反駁大字報本身就是一個

罪行，而且可大可小呢。

大字報的許多語言，是隨着形勢發展而滋生的。例如，××寫的××書，在大字報就演繹為「××炮製的大毒草」，又如妻子本稱「愛人」，大字報裏就變成了「狗老婆」，兒子也成了「狗崽子」。「犯錯誤」這樣的詞也嫌輕，而是「罪該萬死，死有餘辜」。說別人大膽就是「賊心未死」，「狗膽包天」，「瞞天過海」。罵別人腐敗就是「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頭頂生瘡，腳底流膿」，等等。

一張大字報上署了好幾個人的簽名，別以為都出自本人的義憤，許多都是受命簽名或被拉充數的，也有一些用革命組織的名義，其實不過是無名小卒一人。我們作協就有一個「全無敵」的戰鬥小組，像飛彈不絕的發出了許多大字報，其實不過是出自一位平常沉默寡言的女同志的纖纖玉手。

我寫大字報既不高明又不尖銳是眾所周知的，所以極少負執筆之責。一位年青的作家接受新事物較快，不但文思敏捷，書法又流暢，而且勇於執行任務。他沾沾自喜的說：「有甚麼任務交給我就可以了。任何文章，我都能嗅出它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味道。」當然，剃人之頭者，人亦剃其頭，最後，他也變成牛山濯濯了。

我們不但奉命去寫大字報，而且也奉命去觀摩大字報。文革中的大字報頗具實用價值，它所起的傳媒作用，消息傳遞之快，範圍之廣，影響之深，遠遠不是一般報紙可及的。當時的報紙，等因奉此，又經過七查八改，自然是空洞而單調，而大字報既是民間又是官方的，登載的小道消息最受歡迎。大字報有時甚至是官方指揮群眾戰鬥着的部署，而假託某某組織從北京抄來的最高指示，諸如此類的手法，不看大字報，就會趕不上「革命」形勢。還有一點，解放以來，人們對公家的傳媒，從不置疑，養成了懶於開動腦筋的習慣，而現在卻面對來自四面八方，魚龍混合的許多奇聞與秘聞，不免也要皺一皺眉頭，開一開腦筋，對消息的真偽，對運動的來龍去脈作一些臆測，也並非無益的。

作協一拐彎就是中山五路與北京路的交界處，此處大字報最多，也是最惹人注目的地方。通常，大字報傳來「文革領導小組」的「革命旗手」江青的話最多，一句話就影響了許多人的命運。一九七六年，活捉「四人幫」的消息一傳出，廣州文藝界頓慶新生，傾巢出動跑到街上遊行歡呼。隊伍浩浩蕩蕩走過北京路時，郁茹笑着對我說：「旗手不知何處去，老九依舊笑春風！」快哉！快哉！

2. 三反份子罪行展覽會

為了搞臭反黨、反革命、反社會主義份子，有關方面在中山紀念堂舉行了一個三反份子的罪證展覽會，組織全市群眾參觀，我也奉命隨着群眾受教育去了。

當時盛行着「抄家」——不知道為甚麼打着破四舊招牌的文革竟然採取這個最封建的手法。展覽的實物就是從那些三反份子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家裏抄了出來，又認為是最典型的。每個展品都附有精闢的說明，真是無奇不有，我說的無奇不有，不是展品，而是展品的說明。

看看以下幾個例子：

其中，展示着生活奢侈與腐化的，有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樓棲和他的夫人——作家郭茜菲女士。這兩位都是我的熟人，而他們生活的儉樸卻為同人所共知的。

展品是甚麼？

1. 衣服——西裝各兩套。樓棲夫婦曾被邀請到德國講學，這是他們的服飾。除了國產之外，另一套就在德國特價商場購買，跟名牌掛不上鈎。說明卻是：名貴的盛裝。

2. 小型照相機。說明：吃喝之外，還有玩樂。

3．保健用的紅外線燈。說明：保命哲學，資產階級思想。

至於另一位，就是赫赫大名的陶鑄，最近被揪了出來，成為劉、鄧、陶路線中的一員。他的展品當然是引人矚目的。

陶鑄生活腐化的明證是甚麼？

1．早餐：一杯牛奶和一隻雞蛋。說明：老爺式的享受。

2．一隻陶器的瓶子。說明：用名貴的古董作餐具。

可是這名貴的古董不過是一個四川豆板醬的瓶子，幾毫錢就可買來。

以上的奢侈品的展出，如果在今天，倒可作為生活樸素的典範吧？

不過，另一類的展品卻使人看得心驚膽顫，意想不到的。

那是心懷不軌者罪惡滔天的見證。

梁毅文女醫生的展品就是其中之一。

梁女士過去是廣州有名的柔濟醫院的院長。解放後，醫院改為廣州市第二人民醫院，梁女士本人也成為廣東省政協委員。婦女界中不乏這種有志之士，至老不嫁，督信宗教，把一生獻給社會福利事業，梁女士以此受到各界的敬重，但在文革中也被揪了出來，

竟然不止是三反份子，而是野心家。罪惡多端，鐵證如下：

1. 生活奢侈的罪證：手帕十數條之多。

2. 夢想着當資本家、單幹的罪證：地牢裏搜出了幾件醫療器械。

3. 夢想着國民黨復辟的罪證：保留着解放前一張醫生執業的證書。

4. 這才是最驚人的，就是她想做女皇的罪證：一件高高掛起的龍袍。這件龍袍即是潮汕的特產行貨，繡着龍的睡衣。唉！

唉！證據如山，可惜暴露的不是「敵人」，而是暴露了策劃者自己，在眾人面前展覽着的正是他們自己！

不過，應該補充一些情況，就是「四人幫」塌台之後，在撥亂反正的過程中，好些抄家沒收的東西得以物歸原主，但不是全部，許多都是不知所終了。

3. 鬥爭大會

鬥爭會是甚麼，毋庸介紹。與鬥爭會緊密相連的形容詞，往往是：無情的、殘酷的等字眼。文化大革命既不是請客吃飯和做文章那麼雅致，其殘酷與無情，確是達到史無前例的程度。不過我並不想在這裏

介紹那些驚心怵目的血腥場面，而是介紹一些文人怎樣對付這些鬥爭。

第一種人，就是為數不少的，才氣重，臉皮嫩的書生們，懷着「士可殺不可辱」那種氣概，寧為玉碎，一死了之。運動開始不久，即傳來曾敏之在暨南大學跳樓自殺的消息。他是廣東文藝界中第一個自殺的人，按理，這是相當震撼人心的。但是，人在這時，已不是具有感情的動物，而是克服感情的動物。大家聽了之後，只有大眼瞪小眼，你看我，我看你，人人的心靈之窗，好像加蓋了百葉簾子一樣，不讓裏面的秘密洩露出來。

曾敏之自殺卻沒有死去。自殺是悲劇，自殺不遂卻是悲劇之尤，或者是永不落下帷幕的悲劇。自殺不死的後果，連畏罪自殺這樣的罪名也得不到，只有罪上加罪。罪名之一是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罪名之二是假自殺；罪名之三是以死來抗拒運動或破壞運動。過去，共產黨員自殺就以反革命論處，死了也見不得馬克思，連那些以救死扶傷體現着革命人道主義的醫生與護士們，也要與此種人劃清界線，不肯高抬貴手的。曾敏之犯了甚麼彌天大罪我不知道，但只此「自殺」的行為，已可劃為「現行反革命」，萬劫不復了。

我呢，卻是一聽到曾敏之的「噩耗」就耿耿於懷，非但關心他是否救活了，還擔心他會第二次自殺。此時他固然是群眾避之則吉的對象，而我，何嘗不是一個十目所視，到處有人監視的人呢！在文革中，我一直謹小慎微，怕惹火燒身，禍延家人及後代，但到了這時，不能不豁了出去，冒着險看他一次。

我偷偷的溜進曾敏之的家裏時，他正處在不治也不愈的狀態，和他的妻子黯然相對。此時，再大的同情也是廢話了。我只是用了責備的口吻說：「你怎麼就這樣傻？你不為自己也得為愛人和兩個女兒着想呀。自殺不是你個人的事，連累了她們為你背一輩子黑鍋又何苦來呢！當時你是怎麼想的？」他說：「學生並沒有單獨鬥我，只是集體打鑼遊行。我就是受不了那種壓力。」我頓時想到田漢的兩句詩：「殺人無力求人懶，千古傷心文化人。」其實，千古以來的文化人，未必有過此時文化人所受的壓力！

由於同情心作怪，畢竟我又冒着險去看另一位革命對象——杜埃。他是廣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又是老作家，是天然的革命對象，受到群眾鬥爭比較早。他還健在，見面時我們悲喜交集。他在台上受鬥，下了台仍是受鬥，天天在省委大樓前戴着「黑無常」式

的反革命份子的帽子在掃地，連小孩子走過也向他扔石子、吐口水，我真聽不下去了。他沉重地說：「我也曾想過到絕路上去的……」

當時，我也沉重地想着：「要是易地而處，我會不會這樣想呢？……」

我非草木，聽到有親友自殺，常常有心如刀割之感。老舍自殺了，楊朔自殺了……消息傳來，我都躲在被窩裏哭。到多少年後，我才知道他們不是自殺，而是他殺，那時，我卻欲哭無淚了！

話扯遠了，現在，回頭來再談談面對無情鬥爭的兩個人吧。

有一天，我被安排到暨南大學參加一個鬥爭大會。鬥爭對象是校長楊康華和幾位作家：陳殘雲、秦牧、麗尼和楊嘉，他們都是掛着大黑牌登台。我的位子比較近台前，對鬥爭的情況看得比較清楚。

通常，在雷霆萬鈞的聲勢下，那些被鬥爭者被問到甚麼都只有唯唯諾諾，呼我為馬者應之以為馬，呼我為牛者應之以為牛，低頭認罪。稍一反駁，就是犯了大不韙，後果不堪設想的。

唯獨秦牧則不然。他在群眾萬目睽睽之下，大會主持人如雷貫耳的吆喝聲之中，從容不迫，有問必答。以下是他們的對白：

主持人（以下簡稱主）：秦牧，你到過暨南大學演講，對學生大放其毒，是不是？

台下：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秦：啊？

主：你說過：許多流傳至今，仍為人所喜愛的文學作品，就有值得學習的地方，是不是？

秦：是的。

主：你厚古薄今，向學生放毒，該當何罪？

秦：（徐徐把頭抬起）這話是有理由的。因為作品如無可取之處，就不會流傳至今。

主：（由於他面對群眾，秦的表情他看不見，秦的答話又為主持者自己的聲音蓋過了，就習慣性的喊叫）秦牧有罪！

台下：罪該萬死！

結果，這齣戲就這樣收場了。把鬥爭會看成是研討會，我還是第一次看見，我已為秦牧揑了一把汗了。多年後我對秦牧談到這件事，他說早已忘記了，事實上，他受的衝擊太多了。

可是，你別以為秦牧是心如鐵石的硬漢子，在他成為革命對象的初期，何嘗不起過寧為玉碎的念頭。這是他後來告訴我的。

無端端被劃為階級敵人，又被迫作鬥爭對象，局

外人不會領略其中滋味。在敵人嚴刑下堅貞不屈，在鋼刀下慷慨就義還是易事，而當你的「自己人」硬是要你承認自己就是敵對份子，然後跟着一連串硬軟兼施的手段，沒完沒了，非要屈打成招不可。你招了，又要追問你的犯罪動機，再又要從你的出身進行階級分析，禍延祖宗十八代，你說得不符合他們的主觀要求，就說你避重就輕，意圖蒙混過關等等，日復一日，夜以繼日，縱有銅皮鐵骨，也得蒸發於無形。據說這樣做法在解放區的延安早就有了。還總結為「逼、供、信」的公式。他逼，你供，他信，然後再逼，周而復始。這公式曾明令嚴禁。其實何嘗禁得了！原因無他，受此公式迫害的人雖多，而因運用此公式而立了功，飛黃騰達的人更多，如此而已。

在「逼、供、信」橫流，逼使人變成鬼的時候，吳有恆的表現，又是比秦牧更進一步的。

共產黨員面對敵人的審訊，理直氣壯，義正詞嚴的駁斥敵人，我只在小說中讀過，在電影、戲劇中看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鬥爭者當然許多都是老革命。但他們一想到這是偉大領袖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也只好垂首斂翼，讓別人革自己的命。可是在作協的鬥爭吳有恆的大會上，我才得親見那種威武不能屈的雄風。給他上綱，他不承認；對他指責，他嚴詞

駁斥。按照常例，鬥爭對象一進場，群眾在唱幾句語錄歌，喊幾句口號之後，等他站定，就喝令他低頭，但是吳有恆從始至終，不肯低頭。他個子不高，頭卻挺得高高的。有人按下他的頭，他擺脫了又重新挺起來，與主持者對峙。

吳有恆的表現確使我想到他的詩句：烈士胸懷無暮氣！

有一位老黨員對我說過：「我是黨的馴服工具。在人生舞台上，黨叫我扮支部書記的角色，我就扮支部書記的角色，要我扮反革命的角色，我也得扮反革命的角色！」

然而，吳有恆始終是扮演着他自己。

2 到幹校去

三　最高指示半夜來

序幕已過，該言歸正傳了。

話説那文化大革命經過兩年多，經過了無限多的鬥爭與爭鬥之後，幹部的隊伍已起了變化了。

以我們廣東作協來説，當時連作家、司機、勤雜人等在內，不過三十九人。計開被劃為牛鬼蛇神的就有十九人（都是作家），自殺的一人，入副冊的六人，當了造反派卻站錯了隊的四人。剩下來稱得上革命群眾的不過九人而已。我是屬於副冊中的逍遙派，此等人覺悟不高，鬥志不強，不過沒有甚麼痛腳可抓，對運動漠不關心之輩。

大概由於革命力量的薄弱，一九六八年初冬，上頭一方面命令軍隊介入，又組織了工人宣傳隊協助工作。

在這冬天的一夜，沉寂的廣州忽然響起了平地一聲雷的霹靂巨響，遍及全城。這是我們隊伍奉解放軍宣傳隊之命，到全市去傳達最新的一個最高指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個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這個指示決定了我們全體幹部今後的命運。

追沿其始，是根據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澤東

給林彪寫的一封信。這信後通稱為「五七指示」。信中提出「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又要求：「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是有條件的，都應該這樣做。」此時再發出這樣的指示，就是要我們這些幹部，都得下放到那個大學校去重新學習。那學校就是五·七幹校了。

按當時規定：傳達最高指示是不得過夜的。於是各行各業各單位，在半夜接到這指示時，便上街高呼口號，高聲傳達這指示。寂靜的黑夜被打破了，宣傳聲浪過處，鷄鳴狗吠，萬家燈火齊明，最後各隊到東較場集合時，全市已仿如白晝了。

最高指示傳達之後，就得馬上執行。數日後，我們文藝隊伍，便受命到二沙頭體育館集中受訓。

我沒忘記到二沙頭體育館那一天。通往體育館的橋頭，站立着許多人，許多還是少男少女，遙看我們，言笑晏晏，指指劃劃，情緒高漲。

我正在想，為何我們有這麼大的吸引力呢？及到走近了，我才發覺他們的眼光不是投向我們，而是集中在我們後面的粵劇演員身上。他們一上來，那些熱情洋溢的，期待着的眼光馬上變成了一片迷惘。有的說：「難道這是譚玉真嗎？你相信她演過尤三姐嗎？」有的說：「這是楚岫雲嗎？她哪有力氣在《六

國大封相》裏紮腳推車啊？」我看過楚岫雲的戲，此刻的她：頭上白髮蕭蕭，身體搖搖欲倒，移一步只有兩三寸，也沒有人去攙扶她。看來她真的要走她的人生路上最後一程了。

在那青春煥發的戲迷的對比下，真不知誰羨慕誰！

四　「忠」的生活

到了集訓班，我們新的生活開始了。

一切都是為了五．七幹校作準備。

這新的生活從早上就開始。

操場貼有毛主席像。五．七戰士們，每天要對毛主席像，朝請示，晚匯報。請示和匯報內容都一樣，就是排隊對着毛主席唱歌。歌有兩首：一首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另一首是《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每天三頓飯，飯前也要唱同樣的歌。為了不要忘記，我還是把這首歌詞抄出來：

大海航行靠舵手

大海航行靠舵手，
萬物生長靠太陽；

雨露滋潤禾苗壯，

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

魚兒離不開水呀，

瓜兒離不開秧，

革命群眾離不開共產黨，

毛澤東思想是不落的太陽。

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

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

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千好萬好不如社會主義好，

河深海深不如階級友愛深。

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寶，

誰要是反對他誰就是我們的敵人！

叫我出乎意料之外的，在這裏，我竟然與我的丈夫周鋼鳴相遇了。之前，他是作為文藝黑線人物被押送到警司裏扣留起來的。

我們的相遇就在毛主席像下。我在我們革命幹部隊伍中，他在他的「牛、鬼、蛇、神」隊伍中。兩行隊伍，相距只有咫尺。這咫尺卻比「天河」還闊，豈

止不能片語傳情，連目光也不敢互相交換。我唱的革命歌曲，他唱的是牛鬼蛇神之歌，我向毛主席請示，而他卻向毛主席請罪。我睡的是一般的集體宿舍，而他睡的卻是上了鎖的牛棚大樓！

人間天上，天上人間，此時此地，即使只有幾分鐘的遙望，對我已是意外驚喜了！

集訓的生活就是忠字的生活，軍事化而又加上忠字當頭的生活。步操的時候，要按照革命口號：偉大的領袖、偉大的救星、偉大的……兩字一頓。還要配合革命歌曲跳忠字舞。歌舞不及格還要受到批評。

另一項工作就是做忠字牌，要把一塊七、八寸見方的木板磨得平滑如鏡，上貼毛主席像，下貼一個忠字。這忠字牌隨時候命，到出巡或有甚麼集體行動時，陪同小小紅寶書，左右揮舞。平常，就放在枕頭之上，總之，就要把革命氣氛搞得濃濃的。

我們小組裏造「忠」字牌時幾乎出了意外。一個隊員的忠字牌上的毛主席像的臉上給揩脫了一小塊，於是逐人檢查，人人舉報，後來發覺是膠水不夠牢。這個忠字牌的作者才倖免於損害偉大領袖的光輝形象之罪。

而我心裏卻有點想不通，人們的枕頭上面，那該是置放領袖頭像之地嗎？

五　注銷戶籍

一個聲勢浩大的動員大會召開了。軍宣同志對我們作了重要的講話。五．七幹校的地址已選定了，是英德縣橫石塘鎮的茶山上的一個監獄。目前已把囚犯遷往東北去了，把地方讓給我們。他勉勵我們要全心全意的貫徹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努力改造自己，並莊嚴地發出了我們要住在茶山、幹活在茶山、死在茶山的豪邁的誓詞。

坐言起行，我旋即回到家裏辦遷移手續，並與孩子們辭行。那時我最大的女兒只有十三歲，其次十二歲，其次是兒子十歲，最小的女兒才八歲。但是那時代的孩子早熟得驚人。我還沒有開口，他們就說，我們都知道了，因為工人宣傳隊來看過我們這四個家長，報告你們的行蹤。這時，我才猛然省覺，我的身份是五．七幹校的學員，子女當然是家長了。

我拿着戶口簿到派出所辦手續。局員很乾脆的將一個「注銷」的大印，打在我的名字上。然後，又把我的三個女兒的戶口，也遷到他們的學校去，此時學校已無課可上了，只有等待着隨時下鄉鍛煉，戶主便是我的十歲兒子了。兒女不約而同的問：「媽媽，我們甚麼時候才回家呢？」

六　出發途中

五．七幹校學員凌晨坐火車向英德出發，每人揹上一個行囊，像部隊奔赴前線那樣。

女作家紫風從來體弱多病，最初她看到最高指示中有「除老弱病殘者外」，便以為可以免役，但同樣是靈台無計逃神矢了。她對自己的健康情況，顧慮很大。對攜帶每一件生活的必需品，都予以考慮，因為下火車後還要步行兩個鐘頭，確是不容易的。她聽說英德天氣很冷，她為了吃藥及治病需要，打算帶一個熱水瓶去。她問我帶不帶？我說：「被子衣服，已夠你帶了。熱水瓶脆薄易碰破，倒不如到英德再買，百貨公司到處都有呢。」她接納了我的建議。

這次到英德幹校去的學員包括了作家、音樂家、美術家、戲劇家幾個協會，還有省文化局、省圖書館、省粵劇團、省歌舞樂團、省體育委員會、珠江電影製片廠及省美術學院，這些單位許多都是砸爛了或取消了的，只有極小部份在職幹部留在廣州。因此隊伍浩浩蕩蕩，成千累百。內中有不少在解放前拋頭顱，灑熱血效忠革命之士，建國後又吃苦在前，享樂在後，或上山下鄉，或埋頭案首的各種多才多藝之輩，此等忠貞之人，但聞了一聲號召，死灰復燃般重

溫昔日的英雄夢。我們一下火車，便看見有組織的先頭部隊在各站迎接我們。來自大別山，如今是戲劇家的蘇同志，身穿褪了色的軍裝，手持兩片木板，嘴裏唱着快板，使大家想像着這是偉大的長征，叫你精神不能不為之一振。

粵北處處都是崇山峻嶺。我們路過一處高山，上面有白灰刷着的「毛主席萬歲！」五個大字。軍宣隊告訴我們，是一位下放幹部爬到上面寫的。那山簡直是斧劈一樣平滑，無路可通，無樹可攀援，真不知他如何能到達那裏。其實，他寫也罷，不寫也罷，不會增損偉大領袖的一歲半歲，倒是他一旦失足，生命就畫上句號了。

據說，此人因此而得了獎。

壯哉、壯哉！

七　革命的幹校

我從來沒有到過勞改場，此刻才親歷其境。這裏是一個很大的茶場，四面青山，一片葱綠，風光倒是不錯的。

我們進到宿舍，那是一間大房子，房子裏是集體的床舖，床舖分為上、下兩層，用簡陋的木板鋪成，

每層可睡二十人左右，每人佔用二尺闊的位置，一個靠着一個的睡覺。由於迅速執行最高指示，囚犯們倉皇撤出，一定也是由於惡劣的積習難移，宿舍竟沒有做好清潔就一走了之，不但床上灰塵遍佈，地上還有七淩八亂的小板凳，軍宣隊叫我們整頓內務時，每人可分享一張。後來我們才知道這小凳如何重要，是囚犯的寶貴財產，我們的生活必需品。如果沒有它，回到宿舍只能坐到床上，到外面集會只能坐到地上了。

我一面拿起這張枕頭式的，高僅五、六寸的小板凳，一面浮想聯翩。陳殘雲寫的特務電影《羊城暗哨》，據說是真人真事，又聽說案中的女主角八姑，是確有其人，陰謀敗露後被判入獄，這裏就是她服刑的地方。現在她人去樓空，不知道她坐過的小板凳，是否就落到陳殘雲的手中，又不知我拿着的小板凳，前一個坐者又是誰呢？

此種小板凳，對成人來說，實在太矮了，很不好坐，但此時已成為廣東許多五·七幹校的標準坐椅，沒有人敢破壞它的統一性，只可憐那些傴僂的老幹部，不知如何去適應了。

英德茶場出產的茶葉，簡稱「英紅」。據原茶場負責人介紹，是在國際上負有盛名的。它的特點是攙了牛奶之後，色澤還是紅的，因此特別受到英國女皇

的喜愛，如果一天她沒有嚐到，皇宮就要打電報向北京英國大使館追問云云。

他又介紹製茶最主要的工序是去除青味，外國人對此特別敏感，英德茶場請了一位高級工程師，專門試茶，鑑定了完全沒有青味才能出廠。這人的工資高達每月數百元，文化大革命一來，就被群眾革掉他的職，滾回老家去了。

我們來茶山的主要勞動是種茶。但是我們的主要任務是改造思想而不是生產。須要弄清主次。後來，我們就把若干畝茶田鏟平來做房子，再後，為了「以糧為綱」，又鏟了茶樹來種田，英紅於我何有哉！

八　飛來橫禍

幹校是幹革命的，除了勞動外，主要就是「學習」，學習不只是紅寶書，而是活學活用的實踐——大批判。

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中國共產黨取得勝利的關鍵之一。但是，此時此刻的大批判，不在乎自我批評而是批評他人，不是一般的批判而是上綱上線的批判。

舉一次大批判為例：

廣州鐵路五·七幹校也和我們一樣，「小板凳」

是幹部的重要工具。可是他們沒有我們的優勢，囚犯們把這重要的遺產留給我們，於是他們的便自力更生，親自動手來製造。有一個學員用了三口鐵釘製造小凳子（天哪，我真不知道三口小鐵釘怎樣可以把小板凳釘得牢呢！）結果，竟被拿去示眾，作為浪費的典型，還當作反面教材，在全省的幹校中進行批判。（原來，應該用竹釘代替哪！）

我原來對紫風說過，到幹校來才買暖水瓶的。到了幹校之後，才知道鎮上雖有百貨公司，但是只有幹校指定的人，才有權到鎮上去。我們連隊中被指定可上街的人是詩人陳善文。他為人忠厚，樂於助人。於是我們便拜託他為我們買一個竹殼的暖水瓶，這是售價最便宜的，不過二元左右一個而已。陳善文給我們把暖水瓶捎回來，他說找遍了全鎮大小店子，都沒有竹殼，只有鋁殼這一種，他替我們作主，買了一個回來，價錢是五元，我和紫風向他道謝。

一天，早晨集隊，解放軍指導員忽然嚴厲地向大家宣佈一件大事：連隊裏有人犯了嚴重的錯誤，買一個貴重的暖水瓶。這人從來是高工資、高稿酬、養尊處優，享受資產階級生活，今天竟然在革命化的幹校裏做出這樣腐化墮落的事，必須重視。勒令先在全連檢討，再擴大到全校，到上報省領導，作為一個大批

判的材料。義正詞嚴，如臨大敵。下午先在各班佈置工作，看來一場大批判是免不了了。

在這樣緊張的形勢下，作為全場的靶子，我只好心情沉重地檢討：「我誠懇地向大家檢討……我犯了……」

話猶未了，左邊一個女同志應聲地站起來：「我誠懇地向大家檢討，這是我犯的錯誤……」

右邊也有一個男同志站起來，說：「不，這都是我犯的錯誤……」

我不禁傻了眼，全場的氣氛也為之一變了。

左邊的女同志是吳紫風，她檢討她是主謀，對暖水瓶她比我更需要。

右邊的男同志是陳善文，他承認是在他手上把我們原有的計劃改變了的，還向我們道歉。

群眾本來以為只是我一個人的事，至此忽然冒出了三個人來，爭着承擔責任，勇於接受批評，本來已準備好的戰鬥部署都給打亂了。

不過，我還是把我準備好的檢討說出來。我說，這都是自己的資產階級劣根性作怪，兼之在作協這裘多菲俱樂部的黑染缸浸淫得太久，竟然把這腐化的作風帶到五·七幹校來。喝水就喝水算了，為甚麼非喝熱的不可？多少勞動人民幾千年來都喝山水、喝井

水、喝河水、喝未經煮沸的水，我們下放為着向貧下中農學習，為甚麼竟連這小小的熱水都捨不得放棄，可惡的資本主義尾巴都捨不得割掉呢？……

我像一個蹩腳的小學生努力寫文章，引不起大家的特殊反應。但是紫風是散文家，她可能感染着她的丈夫秦牧的作風，檢討時有板有眼，娓娓道來，她說：「由於有人需要喝熱水，因此國家就有暖水瓶的生產，生產了就要銷售。橫石塘是一個小鎮，店裏不供應竹殼暖水瓶而供應鋁質暖水瓶，究竟面向甚麼群眾？是人數眾多的貧中下農還是其他人呢？反正，我們買它是不應該的。」她說話時有問有答，疾徐適度，態度溫和，使得聽者不得不隨着她的檢討而峰迴路轉。

這暖水瓶到底不是小板凳，本來可以掀起全省的一場暴風雨終成了茶杯裏的風波而告終。在我們的第一班裏，有時還有人把這事稱為「暖水瓶事件」，暗下引為笑談呢。

九　解放幹部的悲喜劇

到幹校來的有幾種人。按等級劃分，最高的領導層就是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其次是工人毛澤東

思想宣傳隊。其餘都是學員，或稱為五．七戰士，到這裏來住於斯、幹於斯、死於斯的幹部，他們都屬於連隊編制，我們幹校有七個連，連以下為班。班是最小的單位了。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雖屬於各單位的幹部，卻不在幹校的編制之內，在幹校中可謂天之驕子，這就是專案組人員。他們人數不多，卻掌握着許多人的政治生命。他們或而全國滿天飛，搜集別人的罪證，或而呆在專案室裏，埋頭編造檔案，偶然也曝一下光，到外面來採幾個鐘頭茶，插幾百株秧苗。另一部分人則是來而復去的所謂新隊伍，到幹校來只是鍍一下金，稍作逗留便調走了。他們根正苗紅，是上頭認為經得起考驗的接班人，他們也以此自豪，臨走時意氣風發地在崇山峭壁上用白粉刷下了：「三軍過後盡開顏」的大字，與前時塗上「毛主席萬歲」的幾個字互相輝映。使以後路經此處的五．七學員為之悚然。

此外，命運變化最大的就是由「牛棚」來的牛、鬼、蛇、神，組織起來，所謂的特別班了。這些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及反動學術權威，經過專案組審查認可之後，一旦解放了出來，又是一條好漢，有的官復原職，有的還當上領導呢。紅線女便是其中之一。她解放出來之後，便被任命為廣東省文化局副局長了。

不過，放牛出棚，又規定有若干手續。他們既是群眾在運動中揪出來的，便得經過群眾認可，才能解放。

人總是有幸有不幸。

到幹校不久，先要解決問題最輕微的人。其中一個是四連（粵劇團）的女演員譚玉真。譚玉真除了演技精湛，可構成權威之外，為人平和，跟「三反」沾不上邊。專案組準備解放她了。在解放前夕，專案組為了做她的思想，也為了防止漏網，便找她談話，不談解放，而談她的材料已審查過了，明天群眾就要開個大會，叫她進一步交代，一定要徹底坦白，才能爭取群眾的寬大云云。到了次天，在女廁裏，就發現了譚玉真吊死了。她演了一輩子戲，卻分不清真和假，哀哉！

陳殘雲是廣東作協較早要解放的幹部。解放前一天，專案小組召集我們向我們交底，說，明天要開一個鬥爭式的大會，使陳殘雲進一步交代，然後解放，免留後患，即使他解放以後，也能戒驕戒躁，更好為人民服務。他們作了戰略部署，各人有所分工。我是分工去鬥爭他的出身問題的，即是他的成份是否假的。

我一時忍不住傻裏傻氣的問：「陳殘雲的階級出

身，你們不是經過長時期的內查外調，還有甚麼假的嗎？」

他們說：「這就是要進一步使他坦白。萬一他還有所隱瞞，那怎麼樣？」

我心裏說：「那被鬥爭的該是你們了。」

結果我在會上一言不發。陳殘雲終於順利解放了，到底，他不是小花旦那麼脆弱的！

十　一塊肥豬肉

說文藝界是一個大染缸，在那裏工作過的人都是精神貴族，那是天大的冤枉。例如貴為廣東省委宣傳部的副部長杜埃就是以儉樸聞名的。有一次我無意中到他家裏，他留我吃飯，原來是他的五十大壽，他的夫人林彬親自下廚，弄了一個紅炆豬肉及客家的釀豆腐丸，如此而已。蒙他盛情招待，勉我加餐，一口一塊釀豆腐，便是對嘉賓的特殊招待了。他的子女衣着之樸素，食用之簡陋也是眾所週知的。

林彬這時和我同一連隊，同一宿舍。她是個菲律賓歸國華僑，但是儉樸程度，遠非一般人可及。我們睡的是粗木板，因此都得在上面舖一張草蓆，再放被舖。但是林彬連草蓆也不用，只拿出版社包書用的

四四方方、毛毛草草的散了邊的草蓆，上一塊、下一塊鋪在床上便算。其他更不用說了。

我們到英德時是冬天，英德是苦寒之地，氣溫常常降至零度以下。我們採茶又必須在早晨開始，雙手暴露在外，凍得像紅蘿蔔一樣。茶葉是不能等待的，在下雨天也得穿着雨衣，踏着皮靴進行採摘，臉上常常出現爆拆，但是誰也不敢去買潤膚用品。我受了「水壺事件」的教訓後，只好誠心誠意的頂風冒雨去鍛煉自己了。不過，口頭上經風雨可說得輕鬆，肉體上的經風雨就十分難受。

林彬有一天輕輕拉我一把，說：「我介紹你一個好方法。」原來她在我們用豬肉「加菜」時，留起了兩塊肥豬肉，用玻璃瓶盛着。我們宿舍的環境是軍事化和簡單化的。除了睡時佔一個床位，床下也只准放一張小板凳及一雙靴子。室內兩頭各放一張長約一米半的桌子，用竹子搭起來的。一張准各人放食具及醬油，一張放漱洗用具。所以林彬這兩塊豬肉便面臨當人暴眾的命運了。

我真不知當時人們的腦子裏想甚麼。林彬好心好意介紹我用肥豬肉擦面，我不擦是因為我覺得不太衛生就是了。而她這一舉，卻引起軒然大波，批評她醜化文化大革命。身為文藝幹部，又是部長夫人，竟然

連護膚膏都買不起，要用肥豬肉護膚。林彬平常是一個溫婉的女人，可是她決不隨便屈服於群眾的批評的。因此，這「豬肉事件」反覆引起了爭論。奢侈浪費要批評，儉樸也一樣受批評。因為，那是大批評的年代。

十一　種菜的階級性

五．七戰士應該自食其力，因此得自己種菜。於是，一、二連合成一個種菜班，在各個班裏抽調一些刻苦耐勞的人去參加，因為需要與大糞打交道，及挑水挑菜，不像採茶那麼輕鬆的。上級從作協班抽出一個人，這個人就是我。

種菜在幹校可說是一件極其重要的事。因為戰士們都是以素食為主的。沒有青菜簡直不行。不過，種菜對我們又是一門較陌生的學問，何況，英德的氣候與珠江三角洲不同，還要有一番熟習過程呢。

要說種菜的勞動強度，試舉一例。有一天早上我隨着戲劇家協會的董勵和莫日芬推糞水到數公里以外的七連菜地裏施肥，這天我們一直工作到下午二時才回到連隊。董和莫兩位在出發前上過磅，現在又再磅一次，每人竟輕了六市斤。我在電影中看過空軍上天

回來，從皮靴倒出幾磅的汗水。原來種菜流的汗水也是那麼多的。

要說種菜者的心情，我又一次向菜班的同學致敬。他們非但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髒，其忠心赤膽，徹底向貧下中農學習的心情也至為動人。試舉畫家王立月夜淋菜的詩為證：「射桶擊水月影碎，淋菜更比吃菜香。」境界何等的高！

至於我，我的思想境界可沒那麼高。到了幹校，丈夫則在咫尺天涯的牛棚，年幼的兒女則遠離膝下，獨立生活，若是沒有甚麼來轉移精神，是很難支持的。《紅樓夢》黛玉死後，寶玉便逃「禪」，此時我便逃於勞動，只要人不停勞動，腦子就不用再胡思亂想。我到幹校後，勞動態度特佳，元旦別人放假我也請纓到廚房工作不休息，開工常常早出晚歸，因此也獲過五好隊員稱號，其實都是不現實的，事實上是逃避現實的。——這是閑話。

言歸正傳，由於我們種菜是初入行。因此就向貧下中農請教。全國各行各業人民都同讀一本書——紅寶書。貧下中農不但與我們有共同語言，思想境界還比我們高呢。有一位農民廖同志，對我們特別關心，除了介紹本地的水土、氣候、植物品種之外，他語重心長地說：「時代不同了，種菜也要有階級性。

菜心、芥蘭、荷蘭豆，味道雖好性情卻嬌，要人諸多服侍，那只是老爺小姐的菜。我們貧下中農歷來都是吃苦麥菜長大的。苦麥菜可長於貧瘠之地，也不要求精耕細作，不像地主階級那麼貪威識食，怕熱嫌寒，正是我們貧下中農的可貴本質。你們何不種苦麥菜呢？」他的話不但寓意深長，簡直就是一篇完美的散文。我們是來虛心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於是，謹遵他的教訓，種了許多苦麥菜。

我們種苦麥菜，同志們吃苦麥菜，早餐吃，晚餐吃，昨天吃，今天吃，明天吃，吃得同志們都苦着臉不吃了。廚房也通知我們菜班，不用再交苦麥菜來，免得浪費生油，那時油是很難得的。

怎麼辦呢？地裏的苦麥菜還一片蔥綠，等待收割，而嬌生慣養的老爺小姐菜，差不多都沒有了。我們菜班班長就組織了一個宣傳隊，手拿竹板，用勺子敲着臉盆逐個班去唱快板，希望激發各人的階級感情。快板有幾首，我只記其中一首：

說青菜，

說青菜，

青菜裏面也有階級愛。

小姐老爺愛菜心、荷蘭豆，

貧下中農愛苦麥菜，

……

五·七戰士不怕苦，

麥菜愈苦愈可愛。

……

此外，又編了一個快板則是兒子不願吃苦麥菜，老頭子與他憶苦思甜，回憶吃苦麥菜的日子，結果，父子倆流着淚大箸大箸的吃了。

可惜，藝術不能發揮它的作用。最後，我們菜班只好種了許多菜心、芥蘭、荷蘭豆、豆角、椰菜花、番茄，大家也學得一些知識，同志們這才誇奬我們。

廖同志起初常到菜地看我們，從此愈來愈少了。後來，一直不見了他幾個月，我問其他的農民。原來有一天，他和朋友在草地上遇到一條眼鏡蛇，那朋友一鋤頭把蛇殺死，而他卻害怕得暈去，回家還害了病呢。

十二　沉默的羔羊

幹校過節日的時候，偶然也有加菜。這些肉類的來源也是自力更生的成果。

說起來這還是受惠於從前的住客——囚犯。他們飼養了一群豬和山羊。

被派去牧羊的是郁茹。

郁茹是一個小說作家，過去因創作小說而成名，文革中也因種種「錯誤」而進出牛棚，她現在當然不寫小說了，不過，她還在寫，不是用筆，而是用生活，在我們幹校，每個人都是一本小說，一本看不見，卻停不下的小說。

郁茹的丈夫在暨南大學任教，文革在被審查之列。有一天郁茹的女兒樓丹突然到幹校來，告訴郁茹：樓雲芳自殺了。樓雲芳是她的父親。她此時只能指名道姓的稱呼他。解放軍宣傳隊領導也這樣告誡郁茹，要和樓雲芳劃清界線，不能為樓雲芳流一滴淚，而我們也竟然看不見郁茹為樓雲芳流一滴淚。雖然在我心裏已為郁茹一掬同情之淚了。多年後郁茹才告訴我，她不過不給他們看見就是了。

郁茹不但能克制眼淚，還能苦中作樂，她常常邀我一起去牧羊，一邊牧羊，一邊認識草藥，人們當時都無書可讀，草藥卻是新事物，老幼咸宜的。

郁茹對每隻羊都很熟悉，如同自己的孩子一樣。羊本來就是一種溫順可愛的小動物，又頗解人意。小羔羊尤其好撒嬌，你逗逗牠，牠便伸出暖暖的舌頭舐你的手，用那軟綿綿的下巴來磨擦你，用那溫柔的眼睛來望着你，十分叫人憐愛。英德本來是山明水秀之地，如果忘記了一切憂患，牧羊倒也另有一番樂趣的。

有一天，記不得是甚麼節日，大家都上山下田勞動去了。廚房催着要青菜加餐，我便匆匆割了一擔菜，挑到廚房去。忽然，我看見郁茹所看牧的一隻小羔羊獨自在樹下徘徊，沒有人在旁。我正在奇怪，細看之下，原來小羊的胸口插着一把刀，鮮血涔涔，從傷口滴到地上，斑紅點點。但是這小小的羔羊，既不呼痛，也不掙扎，若無其事地，像平常一樣，用一雙溫柔的眼睛看着我，緩緩地走過來，我沒法再看下去了！

可是，那羔羊生命最後的一幕，卻永遠留在我的記憶裏。我第一次親自目睹的沉默的羔羊，我親眼接觸那溫柔地注視着我的目光！我心裏想，在牠那雙眼睛裏，我又是怎樣的一個動物呢？

我考慮了很久，才把我眼見這一幕告訴郁茹。這一天，我們兩個都沒有參加大伙的「生活的改善」。

這晚上，我夢見了我所睡的房子，變成了一個羊欄。

十三　祝你生日快樂

眾人的節日可以「加菜」。

個人的生日可以不可以「加餐」呢？

眾人的節日可以改善一下生活，

個人的生日可以不可以改善生活呢？

且看看徐東白先生。

徐東白先生是當代有名的畫家，曾由周恩來總理敦請回國的。當時還有香港油畫家余本先生及另一位華僑畫家一同回歸祖國。據説當時三人共領工資一千元，掛職在廣州美術家協會。到了文化大革命，自然而然成了「三名、三高」（名作家、名畫家、名演員、高工資、高稿酬、高待遇）的代表。

徐老先生雖然年屆古稀，滿頭白髮，但不知為甚麼不屬於「老弱病殘」之列，也隨着群眾來茶山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成為五．七戰士的一員。

回歸祖國的老藝術家，起碼有對祖國的熱愛，拋棄目前的物質享受，過着崇高的精神生活。在徐老先生的言論中，找不出任何「三反」的語言，扣不上犯罪的帽子，不過他既然拿着高薪（？）又是臭老九，到了幹校，便成為大批判的對象了。

我和徐老先生同在一個連，不同一個班，天天聽到他在大批判時鬧的笑話，使批判會變成了文娛節目。老先生的錯誤在哪裏，錯就錯在他努力學習，食「今」不化。

有一次，横石塘郵局通知幹校去收取一包郵件，

是從國外寄來的。收件的人是徐老先生，由於收件人不能到鎮上親自領取，便由幹校叫人領回來。原來那是兩罐小小的罐頭食物。區區兩罐罐頭食物，微不足道；但那時就如天外飛來的隕石一樣，引起了無限風波，被拿來示眾，作為修正主義的罪證。一位學員給我們複述徐老先生在批判會上的檢討，以博大家一笑。其言如下：

> 過幾天就是我七十歲的生日，我的兒子為了表示孝心，寄了這些食物來給我祝壽，想不到好事竟然變成壞事。

於是，以革命的詞語醜化革命，又成了徐老先生的罪證之一。

為了懲罰這「老頑固」，「革命群眾」在徐老先生七十壽辰的當天，勒令徐老先生脫了鞋子，光着腳丫到水稻田裏，插下數行禾秧（再多也是不能了），要他把這件破天荒的事留在他七十壽辰的記憶裏。

要他記住的是甚麼呢？

你們請不要「面不改容」，也記住這麼一件事吧！

徐東白先生，忘了這一些吧，今後，你能享受那「祝你生日快樂」的歌聲了。

十四　多情卻似總無情

中國有不少富有人情味的成語，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肝膽相照」，「同病相憐」等等。在五·七幹校，就完全用不上。

被關在牛棚的人，許多都是文藝界的精英，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以及對國家民族都有過貢獻的。到現在，誰會挺身而出，為他們說一句公道話呢？

在更深人靜的時候，我環顧着同房的四、五十人，人分兩排，並睡在一張大的竹排上。每個人都是一部悲劇的女主角。她們與男主角共同頂着一樣的星光月亮，白天偶然一碰頭，哪一雙眼睛敢吐露真情！我看着每個人憩睡的樣子，心裏想，也許在夢中她們的靈魂才自由地飛翔起來吧。我從來不敢驚醒任何人的好夢的。

在「特別班」的老友中，我特別為黃新波擔心。他患着高血壓病，是可以隨時奪命的，黃新波的藝術成就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事蹟毋須介紹，而他的性情率真，天生樂觀，簡直就是一個永遠長不起來的大孩子。此刻成了階下囚，連歡笑的權利也給

剝奪了，他可真是比別人更難受的！忽然，一天消息傳來，他的血管爆裂，送進醫院急救，我真像五雷貫頂一樣，不知所措！我知道目前既不能看他，連為他說一句話也不可能且沒有用的。此時我便想到法國作家左拉的故事。左拉為了給一個不認識的軍官討回公道，挺身而出，為他說話，把自己一生的幸福也付出了：我的天，為什麼我竟是這麼懦弱無能呢？

我在這時立了一個誓，如果我比新波後死，我一定大聲告訴人家：「新波是好人，新波是被冤枉的！」這就是我所能做到的一點了！

新波的妻子章道非睡在我對面的床位上。她不和我在一個班共同學習和勞動。她總是悶聲不響的，和我打照面也不跟我打招呼。此刻她更像撲克牌的牌手一樣，木無表情，使我無從忖測新波是凶是吉。

這時，新波的女兒黃元獲通知從廣州趕來看他。我一方面擔心着是否他更危殆，另一方面卻高興可以見着這小女孩。她先到醫院才到我們宿舍來。從章道非和黃元的表情上，我便知道新波得救了。

黃元須要睡在我們宿舍裏，我便自告奮勇讓出我的床位給她，而到對面跟章道非擠在一床。

趁着無人注意之際，我向章道非：「你怎麼總是不理睬我？」

道非說：「莫非你瘋了？有一天新波和鋼鳴一起勞動，新波不知道對鋼鳴說了一句什麼話，專案組連我也召去問了幾次話呢，睬你？唉！」我再也沒做聲了。

整夜，我扭轉了面，不敢翻身，不敢說話。黑沉沉，夜寂寂，被窩裏伸過來一隻溫暖的手，我輕輕地握着了它。

只是這一刻，我體會到「多情卻似總無情」的滋味。文革以來，我漸漸體會的是「哀莫大於心死」，現在我才知道我的心仍在活着。

十五　遙憐小兒女

五．七幹校為一新型學校，一般學校是父母送子女上學，五．七幹校是父母別子女而上學。

人人把子女留在廣州，人人也把心留在廣州。這件事誰也不敢掛在口上。因為此時口頭都給革命名詞塞滿了。

我們自以為在幹校的天地無限廣闊，其實子女們面對的天地比我們的天地複雜得多，說的是經風雨，見世面，但是小草小苗將如何經風雨呢？

年紀較長的孩子有更大的自由，他們既是革命世

家，許多自告奮勇，請纓到最艱苦的邊疆、農村去。大多數是請纓到艱苦的海南島開荒，更進步的像搶着參軍那樣到北大荒、內蒙古、其餘就到較偏遠、貧瘠的農村。那些年紀較小的留在廣州當家長、上學校，自煮自食自管家。

頻頻有些消息傳來，例如黃××的女兒到了農村插隊，和當地的一個已婚的轉業軍人相戀，（當時是不用相戀這字眼而是亂搞男女關係。）受到別人殘酷的鬥爭，於是痴男怨女，雙雙自殺，這是悲劇，卻不算很罕見的悲劇吧。可是，最令人驚心怵目的卻是兩人死後，遭到曝屍批判的待遇，這才是真正使人心碎的悲劇，這個陰影在我心頭久據不散。

有些消息則是有些小孩受到別人欺負，或是有些小孩受到壞人引誘，做了一些小偷小摸之類的事。可憐的爸爸媽媽們在幹校裏只能一聲不響，一則家醜不好外傳，一則說了出來也無助於事也。

幹校學員每年只有十天假期。此外，只有在孩子假期時可以到幹校來相聚。我們幹校有一個水庫，是淹了原有的農田做成的。表面一泓清水，波平如鏡，下面卻是坑坑窪窪。靠岸地方水深僅及膝，而旁邊就是原來的糞坑，突然一落丈餘。有一次，一個幹部的孩子來探爸爸，爸爸到了田裏開工。孩子

找爸爸不着，放下書包，到水庫裏游水，結果從此一去不回了。

這個水庫，其實也是我們幹部的娛樂場所。工餘之暇，都到這裏來。有一天我們一個幹部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真真正正的死在茶山了。

我的最小的女兒才十歲，來了幹校度暑假，學了游泳兩天。同伴們愛玩，背着大人，拉她游過對岸。得到那兩位較大的孩子拍胸膛的保證，小女兒不知天高地厚，跟着她們游出去。那知對岸竟如是之遠，其中一個大女孩，已驚至動彈不得，快要下沉。另一個也驚惶失措。只有我這小女兒仍然不知身處險境。她只記得叔叔們練習拯救溺者時用手把人托着，再喊人來救。她果然照着做：一面大聲求救，一直用手托着那女伴，等到大人們游泳到來把她們都救起。這真是千鈞一髮的事。事後小女兒因沒有紀律性而受到了大批判。她一直不敢告訴我，其實我也知道了。一則以懼，一則以喜。

至於留在廣州的兩個大女兒，卻各有遭遇。運動開始，那個才十二歲的大女孩竟被吸收到革命組織，活動頻繁。有一天，她參加了調查校長的歷史回來，告訴我：「媽媽，我調查到我們的校長有一樣特別的東西，不知是什麼。」我問：「是什麼呢？」她說：

「是妾侍。我從來沒聽到這東西。」天哪！我不擔心她不懂這東西，而是擔心負責專案調查的人竟吸納如我女兒這樣的人。可憐的走資派們，知否你們的命運被捏在什麼人手中呢？

我的二女兒的經驗可豐富極了。除了參加宣傳隊不算，卻擔任了一切無法稱職的職！她是積極份子，看了別人學針灸她也自學針灸，買了幾本書和一些儀器，以身試針，戳得全身都是針孔。有一次，她告訴我，學校把一些老師關到牛棚裏頭。有些老師說身體不舒服，想請假出外。工宣隊說：「不許外出就醫，叫周××給你針灸就是了。」我聽了捏了一把汗。女兒說：「媽媽不要怕，我都是先用銀針戳戳自己才戳別人的。」

然後，她又告訴我，老師不教「老三篇」了，說自己沒資格教，叫她教。想想看吧！

然後，她又告訴我，廣州那時出現了孩子們的集團——是受了壞人操縱或自發的。學校就派她去採訪，寫了一篇〈黑猴王落網記〉和什麼〈小霸王回頭記〉之類，分發給本區小學閱讀，提高警惕。我聽了只有苦笑：如果她是大人，這些作品早就被列為毒草，本人也打入牛棚了。

但是我畢竟既沒有鼓勵她也沒有阻止她，須知，

那個年代人們說是子教三娘，不是三娘教子的時代了。直到有一天，她們學校的領導對她說：「周××，我們想培養你作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她才恍然大悟為什麼過去學校這樣器重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對反革命子女的客氣的稱呼）。女兒說：「我家並不反革命，我不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從此不再接受任何任務了。

大女兒被拔高到做她不應該做的事，二女兒被視為她並不是那樣的人，小女兒做了好事當壞事。在那些日子裏我毫不上心，使我揪心的卻是我兒子到幹校來探親的那陣子。

那陣子是我到了幹校一年半載的事了。孩子長的快，已高出一個頭了。他來看我，我帶他到小賣部那裏買些什麼。

就在那路上，忽然我看見他的爸爸從小賣部迎面而來。我告訴孩子說：「快上前叫你的爸爸吧！」須知道，那時我沒有跟他爸爸說話的權利的。

兒子上去了，出現在爸爸面前，滿身被着陽光，親熱地叫一聲：「爸爸！」

那做爸爸的也突然站住了，不知道對面如此彬彬有禮，向他招呼，向他伸手的是誰。耳朵聽不出他的聲音，眼睛認不出他的面貌，一時驚惶失措起來，眯

着眼睛，欠着身子，客氣地說：「哦—哦？你是哪一位……」

站在十來步之遙的我，眼淚奪眶而出了。

3 又搞創作去了！

十六　優詔

「生涯豈料承優詔。」有一天，軍宣隊的的女同志忽然把我召去。她叫我把紅寶書拿了出來，她自己也手拿一本，叫我翻到第××頁去，她和我一起念一段「我們要相信群眾，我們要相信黨……」的毛主席語錄。

我以為她要對我進行甚麼教訓，正在眼看鼻尖的等待着。可是，她忽然自我檢討起來。她說：「我一直以為你是個精神貴族，所以特別針對你。出發到英德時監督着你背着行囊走路，到幹校後看你如何挑重擔。分配床位時把你調到我身邊，使你無法偷懶睡大覺。原來我把你看錯了，你是願意聽毛主席話，甘挑重擔的。」

我越聽越覺得奇怪。一直以來，我是邊緣人物，怎值得她向我檢討。無他，她是北方人，不慣挑擔子，看見我七八十斤的上肩，就改變了觀念罷了。人民解放軍有時就那麼單純可愛，他們不但是「黨叫幹啥就幹啥」，甚至是黨叫他怎樣看東西就怎樣看東西的。

她之所以說了這麼多的話，目的就是傳達上級一個決定，叫我回去廣州一段日子，有新的任務。然後

她又對我嚴肅地念了一段毛主席語錄，叫我戒驕戒躁。我還有甚麼驕和躁可言呢！

領導還再對我動員一次，這任務是相當艱巨的。文化大革命以來，八億人民只有八齣革命樣板戲。即使這樣，文藝戰線上的階級鬥爭仍是時起時伏，形式隱蔽，內容獨特。例如，有些地方，竟然利用樣板戲作為反革命的手段。有一個劇團演《紅燈記》用一盞破舊的油燈改裝成紅燈，有一個劇團演《紅燈記》時，那個演李鐵梅的花旦的嘴裏有兩隻金牙，把革命者的形象醜化了，這都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

八個樣板戲都只能由八個樣板劇團來演出。而每年春、秋二季，廣州都開交易會，需要樣板戲來招待外賓外商。劇團年年南下，未免辛勞之極，而外賓也要求看一些新的節目。中央就打算在演出樣板戲之前插演一兩齣二十分鐘左右的節目。我們的任務，便是試寫這些小節目。

和我同時接受任務的還有戲劇家協會、粵劇團的編劇作家。一行六人。帶着兢兢業業的心情，剋日出發了。

當我們揹着背包，走過六連——廣州美術學院所在地時，恰巧遇上了關山月夫婦倆，大概我們六人奉調回廣州的消息他們已有所風聞。關山月瞪着驚訝的

眼睛望着我們。而他的夫人卻對我說：「黃慶雲，你又搞創作去了？」「又」字拖得特別長。

十七　新的思想境界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窩居在幹校不過一年半載，整個廣州好像已走進一個奇怪的時空隧道。動力就是由於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人們的思想境界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上去了。

你到商店買東西，店員不是首先問你買甚麼，第一句話就是「毛主席萬歲」。你呢，不必說你買甚麼，第一句答話也該是「毛主席萬歲！」

電話鈴聲響，你接電話，不必問來者是誰，也是說一句「毛主席萬歲」，等到對方回答了一句「毛主席萬歲」之後，才互通姓名。

你走到街上，不時有紅衛兵或是紅小兵（小孩子）攔路截問，非要你唸一句毛主席語錄，才給你放行。我的女兒教我說：「如果你不想唸較長的句子，那你就說三個字吧。那是『要武嘛！』」這是毛主席接見紅衛兵時，問一個紅衛兵「你叫甚麼？」那紅衛兵說：「我叫宋彬彬。」毛主席說：「幹麼要那麼文質彬彬，要武嘛！」

毛主席的話，家喻戶曉。

沸沸揚揚，整個城市成了紅色的海洋。

廣州文藝戰線的領導首先讓我們摸摸這時代的脈搏更投入新的境界。把一些小戲作為樣板給我們學習。

我們看的小戲可分為幾類：

第一類是提高階級覺悟，提高思想境界的。

有一齣戲寫一個人，把米放在自己的衣袋裏。原來他的衣袋上有一個小洞，結果米漏滿了一地。他就沉痛地檢討，漏去的不是米，而是毛澤東思想，今後必將加強學習，堵塞思想上的漏洞云云。

另一齣是一個翻身農民生活改善了，兒子把一件破舊不堪的棉衣扔掉，換上一件新的棉衣。於是這父親便責怪兒子的忘本行為，給他進行憶苦思甜，進行深刻的階級教育，把這件懸鶉百結的棉衣當作傳家寶留下來，留給孫子、曾孫將來去憶苦思甜。這類型的戲最多，有時是一頂破帽、一床爛被子或是一間破草房等。

第二類是以階級鬥爭為綱，處處提高階級鬥爭警覺性的。有一齣戲説一個生產隊長粗心大意，叫地主的兒子看鴨群，結果許多鴨子死在這個地主仔手上。隊長這才覺悟起來，痛罵自己，要緊握鴨竿，不能讓鴨竿掌握在階級敵人手上云云。

第三類是敢想敢幹型。有一齣戲是在鐵路經過的

地方，一座土山崩了下來，壓着路軌。鐵路當局立即通知一個鐘頭後經過這裏的火車暫時停開，同時該線的各班火車也得暫停兩個鐘頭，等派人清理山泥後才開車。但是，一個掌握毛澤東思想的工人立即抗議。他根據毛主席語錄「只要有了人，世界上任何奇跡都可以做出來。」他力爭不停車。然後到附近的村子，用毛澤東思想發動村民，一齊動手，把泥土移走。最後一畚泥剛挑走時，後面響起了火車轟隆轟隆的聲音，當班的火車正點安然走過，全線的火車沒有一部受到影響。大家齊齊頌揚「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最高指示。

當時我心裏就嘀咕着，如果我是鐵路的負責人，我寧願火車遲到一兩小時，也決不去冒這個險的。

我的思想固然是落後了，不能宣之於口。當時全國「十億神州盡舜堯」，思想境界高的人如潮湧現，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創造的奇蹟多不勝數。文藝戰線的領導人就派我們去實地觀察，就地取材。

十八　一把米和百把米

為了寫劇本，我們到生活中實踐。

我們拉隊到一戶先進的人家去。

這戶人家是以節約糧食而名聞全國。他的節約很有特點，每頓飯，量米之後，煮飯之前，用手抓起一把米儲起來，每頓一把，每年便有七百三十把了。每頓飯順手一把，不費絲毫之力，便取得那麼大的成績，如果這樣推廣全國，節約起來的米有多少啊！

當然有人可以這樣問：「想節約，少量一點米就是了，何必這樣麻煩自己騙自己？」説這話的人真的像《愚公移山》中的那個智叟那麼思想僵化，拒絕這樣一件新生事物。這裏面不但是認識問題，簡直就有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了。

請看看這現場吧。這只是一個普通的農戶。但由於他們數年如一日地堅持着每頓飯抓起一把米，現在白米已多至「缸滿箱滿」。屋子裏小米缸大米缸幾個都是滿滿的，米還是載不完，還載在很高很大的木箱裏，要爬梯子上去才看清楚，粒粒潔白，恍如珍珠，誰不為之驚歎呢！

我們從梯子爬下來時便都衷心敬佩地向主人念起語錄來：「糧食是寶中寶。」「只要有了人，世界上甚麼奇蹟也可以做出來。」不過，想再念也沒有多少時間了，因為要讓路給後面來參觀的人了。

謝謝黨的教育，叫我們不要盲從，常叫作家深入生活，我常常住在農民家裏。農民儲藏糧食只是存穀

子而不存白米的，因為白米存久了便會生蟲，便會發霉。存了那麼多的白米不是為了展覽是為了甚麼呢？

謝謝黨的教育，叫我們時刻「要心裏有數」。我心裏真的計算一下：每頓飯抓起一把米，為了容易計算起見，每把算它一兩，每天二兩吧，十天二斤，每月六斤，每年不過七十二斤。存了多少年才成為這種「千斤戶」呢？

可是當時我們誰也不許懷疑。懷疑了怎能寫劇本呢？反映這樣偉大的現實已是不容易，更何況作品是要源於生活，又要高於生活的呢？

當時我與一位青年作者潘君一組。他是一個粵劇編者，頭腦很靈，經驗也豐富。我們兩人便坐在一起度橋寫劇本。

以下是我們的構思過程：

矛盾——戲劇得從矛盾展開。這個戲的矛盾應該是浪費糧食與節約糧食的矛盾。

語錄——已在農戶家念過了。

人物——人物是代表矛盾的兩方面——節約與浪費，即先進與落後。人物的性別應該是女代表先進的，男代表落後的，這也差不多是公式了。

但是一到了具體事實，就發生問題了。起初我們以為要緊緊抓住一把米。哥哥用一把米喂雞，妹妹就

和他憶苦思甜，哥哥就改過，妹妹又提出了「一把米」的儲蓄方法。似乎這樣就萬事皆備了。

忽然，潘君提出來說：「不行，這樣一定會犯批評，妹妹既然先進，為甚麼會有這麼一個落後的哥哥呢？」

我很為難地說：「那麼，就不要哥哥落後了，老媽媽怎麼樣，老人家總是保守點的。」

潘君又搖頭說：「不，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先進的女兒有一個落後的媽媽，那就更受批評了。」

我說：「有了，那麼就是嫂嫂吧，嫂嫂是別的人家的人，思想總有些差距……」

潘君先初有些同意，就安排劇情的開頭是豐收之年、新春大慶，嫂嫂做了一些點心回外家拜年，就給丈夫和小姑批評起來。這三者之間也有差距，哥哥節約糧食，比嫂嫂的思想境界高，妹妹又創出了一把米這個方法，思想境界又比哥哥高。總的，最高思想境界還是女的佔盡了，大概差不離了。

我說：「這小戲寫成了，就公開演出嗎？」在我的心裏總有一些不是滋味的滋味，這裏從頭到底都貫穿着一個「傻」字。可是我甚麼都不說。

不過，潘君畢竟是一位多謀善慮的人。他說：「豐收之年，出嫁的女兒拿糧食做一點點心給外家也

認為犯路線錯誤，共產黨不能這樣沒人情味吧？」

我說：「那麼，連嫂嫂都不落後，那就只能是先進思想差距的矛盾，這樣的矛盾就不夠尖銳了。」

潘君說：「當然，最尖銳的矛盾是階級鬥爭，最好能創出一個階級敵人來——不過，敵人一出，一把米的節約主題就沖淡了。」

我們二人始終無法下筆。過了許久，直到我們被召回幹校的時候，其他兩組都寫不出。組織上只留下何芷一人去寫。

我們回到幹校之後，何芷有信給我們，他說，如今已不是一把米，而是百把米。因為全國各地，都出現同樣先進事蹟，處處都有人用這樣方法節約糧食，處處也有人寫「一把米」的劇本，這真可謂「德不孤，必有鄰」。一把米竟成了思潮了。

究竟何芷有沒有完成這創作及有否上演，我不知道。但是我和潘君，都交了白卷。

十九　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上）

為了寫劇本，我們繼續拜讀學習毛澤東思想積極份子的資料，最後，決定到先進單位，博羅縣的龍華大隊去。

龍華大隊是軍區直接蹲點的隊，它的特點就是全面貫徹毛澤東思想中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在這方面的先進事蹟和先進人物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是一位陳錦娣小姑娘，才十六歲；另外一位就是領導大隊的梁書記。

為了更好的學先進，寫先進，我們四人都住進先進份子家裏。

何芷是老劇作家，他住進陳錦娣家裏。她家中只有老父陳金伯，也是思想境界很高的。

陳錦娣的先進事蹟有兩件比較突出。其一是她的爸爸本來有一個小果園，有不少果樹，每年收入也不少。但是在一次「鬥私批修」的大會上，她動員父親斬斷資本主義尾巴，把果園獻給了大隊。其二是她的哥哥娶嫂嫂，她說服了新娘的母親不辦婚筵而辦蕃薯野菜的憶苦餐，生產隊社員一面吃「喜酒」一面憶苦思甜，把一個結婚的喜筵變成了社會主義的教壇，備受解放軍的表揚。

陳錦娣也因此而被選為全國人民代表。我們到龍華的時候，她到北京參加國慶觀禮去了，龍華社員把她看成了先進的旗幟。半夜裏她從北京打電話回來報喜，說看到了中央首長，群眾便都集會傳達，紛紛表示決心。

在她的先進事蹟帶動下，社員們都紛紛把自留地獻給了生產隊，而且不斷的學先進，她的哥哥的外母——陳金伯說她的頭是比較難剃的，也拋開了對她的成見，反而向她學習，天天學習毛澤東思想，不甘後人。最近，煮飯前也那麼抓起一把米，把毛澤東思想學到家了。

梁書記也是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積極份子，但作為一個成年人，又是一個幹部，當然，鬥私批修的事蹟就不如陳錦娣那麼突出。但，龍華卻是全省著名的先進大隊，它的領導當然是了不起的。我為着更好的理解全面情況，學習站到更高去看問題，就住在梁書記家裏了。

二十　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下）

龍華大隊先進在哪裏？在於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風氣，前面已說過了。

在農村中，「公」與「私」的一個突出的分別表現在農產品的售價上。一般農作品都有規定的公價，而市場卻有市場的價格，二者相差很遠。在市場上，你要用公價去買東西，根本買不到的。

農民除了交公糧、賣公糧之外，還有交售生豬、

雞和雞蛋的義務。但是儘管政府三令五申，豬、雞和雞蛋的任務農民總是不願意完成，甚至諸多借口，千方百計去逃避的。

這裏，有一個奇妙的因果關係。拿豬肉來說吧，本來，想多收購豬肉便讓農民多養豬就是了。但是，當局偏偏怕這樣做便滋長資本主義，會使許多人富起來。因此明文規定，不許多養豬，除了交售給政府的部分外，自己只能留起小部分自己吃（稱為自留肉）。超過這標準，便是資本主義。

這樣，各鄉紛紛立例，不一而足。有的規定養豬超過兩頭便是資本主義，有的規定養母豬就是資本主義，因為母豬會生小豬的。連殺豬也有規定。犯了規定，自己殺自己的豬也是屠殺私豬，要受懲罰。養雞也規定了數目，不許成群。雞生蛋，蛋又生雞，雞不能多，蛋就自然少了。

唯獨龍華大隊，在毛澤東思想領導下，奉公守法，不但生豬、雞和雞蛋都十足交公，而且到墟場上出賣的農產品，一律按照公價。不但這樣，如果墟場上，有誰不按照公價售賣產品的，龍華大隊的社員，就會對他進行批評。曾經有一個外鄉人，帶了一隻鵝到市場出賣，開口不是公價，給龍華大隊的一個女社員發現了，就上前對他進行說理：「你高價賣鵝，所

得不過幾塊錢就是了，但是你卻出賣了毛澤東思想，出賣了貧下中農的本色了。」那人只好帶鵝而退，但那女社員還要繼續對他進行教育，非要看着他按公價賣鵝不行。人走她追，為了一隻鵝，兩個人在市場上追逐了三個圈，成為奇談，這女社員後來便受了表揚。大隊中，像這樣先進的人物不少。

龍華大隊就是這樣一個「君子國」。老人成立了「老人班」，七老八十的老婆婆到省裏表演過「忠字舞」，受到表揚。社員早上學習一個鐘頭毛澤東思想才開工。每隔多少天，生產隊就開會討論公事，鬥私批修。

這樣，在「全國學大寨」的呼聲中，龍華大隊成為先進單位，生產隊計算工分，不是以勞動成果，而是以政治評分的，思想境界愈高的人，工分也愈高。

梁書記是一個普通農民，受過基礎教育，農村工作經驗豐富，生活沒有特殊化，只是會議之多使得他無法抽身參加勞動了。他的妻子懷着身孕，除參加勞動外還不能不跑到二、三十里的山上去割草砍柴。他常常為艱苦勞動的社員默默歎氣。我住在他家，參加所在地的生產隊勞動和開會。我對他反映隊裏的情況，他給我仔細分析，坦誠地交換意見，常常有比較精闢的見解，談言微中。

龍華生活比一般農村稍好是來自它的大隊企業——一個磚瓦廠。農村製造磚瓦是很方便的，建起了窰，從地上挖泥，做成坯子，加火燒足時間就行了。農村人口增加快，又沒有多少消費，時刻建新的房子。磚瓦沒有公價限制，賣磚瓦是有利可圖的。

不消說，農村的磚瓦廠不只龍華一個。不過，龍華的磚瓦價格常常是比較便宜的。

但是，新的情況發生了，燒磚燒瓦是需要草和煤的。這時，草和煤都漲價了。草的來源是農民，社外的農民比社裏的農民更多，社外的農民就不肯低價出售。煤是國家供給的，此時的升幅更大，公價是不能降價，是鐵價。

在這樣情況底下，龍華附近的其他各大隊的磚瓦價格都大大提高了，龍華怎麼辦呢？

在一個晚上，農民展開了激烈的辯論。辯論中，語錄不斷地被運用。最後得出結論，要提價，但要提得比別的隊低。怎麼低法呢？起碼不虧本，因為本錢增加了。

在會議中，社員也向組織報告了物價情況，本大隊的某某生產隊出賣鵝花——小鵝，是按市價最低價的。某某生產隊賣小豬，也是按公價的。於是，大家就散會了。

會後，我向梁書記報告。他笑了一笑說：「這些鵝花、豬仔其實不過都是分配給生產隊社員而已，不是到市場出賣的。」跟着，他又告訴我：「我們龍華大隊在這裏的墟場抓公價抓得那麼緊，別的大隊的人都不拿東西到我們這裏賣，墟場快沒有東西賣了。我們生產隊的東西所謂堅持公價，不過自產自銷，鵝花和豬仔。情況就是如此。」

我對他讚揚了社員的積極性，肯低價出賣磚瓦。他對我說：「我向解放軍報告過了，他們一定要我們堅持原價，不許加價。」

我說：「這能行麼？」

梁書記苦笑說：「只能這樣幹。」可是，他很沉痛地說：「這樣做我真怕損害了黨和群眾的關係。」

這年輕領導人的心裏話真的震撼了我。他確是一個很有政策水平的人啊！

兩天之後，大隊舉行了學習毛澤東思想大會，各人鬥私批修，連在腦間的一閃念也要自我批評。

我清清楚楚看見梁書記在大會上沉痛地向全體社員檢討，由於腦子裏的「私」字作怪，曾有一閃念，把磚瓦價格提高⋯⋯。我只記起了他昨天的話，有說不出的滋味。

我想：國營煤價的提高又該誰來檢討呢？

龍華大隊社員愛在住屋附近種果樹，蔚然成風，卻也成了收入頗為可觀的家庭副業。有一天，社裏召開了社員大會，作出對自留樹的規定，設立了一個標準尺度。只能把這個小範圍內的果樹劃為自留樹，超過這範圍的就歸公。因此許多戶的果樹就要被沒收了。社員們起初默不作聲，後來學習了「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這條毛主席語錄後，受了教育，竟然有幾戶社員把已經劃到自己名下的果樹也主動獻了出來。一個宣佈政策的大會竟然成了鬥私批修的大會，受到了領導者解放軍的表揚。

回到梁書記家裏，他問我：「你看這大會開得怎麼樣？」

我說：「社員的思想境界挺高的，大隊又增加了一筆收入了吧？」

他沉默一下，說：「不過，我怕以後再別指望社員栽種果樹了。」

我也沉默起來。

最後，我離開龍華了！龍華大隊的社員們，我是愛你們的！可是，為你們寫頌歌，慚愧我可沒那生花妙筆啊！

二十一　《小螺號》

在醞釀寫小戲的期間，我和何芷又被抽調到廣州，修改一齣電影。據說，中央對電影製作管制有所放鬆，因此，省珠江電影製片廠就拍製了一部兒童電影，完全根據階級鬥爭的原則，又以「三突出」的創作方法為依據的。所謂「三突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一部電影拍成了，再組織人提意見修改，把拷貝當成原稿紙，何等的重視，亦何等的浪費！

這部電影叫《小螺號》，內容是以一個南方的海島為背景。最近國家進行勘探石油礦藏時，有一個潛伏多年的特務企圖竊取情報，結果給兩個漁民小孩偵破，面對面鬥爭，將他擒住了。

幾位專家對這劇本進行分析，建議修改。

我呢，從下面幾點去考慮：

首先，這故事是否能成立，就要看這特務是來自何方的。

如果這特務是受台灣方面指使的，那麼他就是國民黨退出大陸時遺留下來，要他等到二十多年之後，在共產黨勘探石油時竊取材料，那國民黨簡直就有未

卜先知的法力了。既然有這神奇的法力，又何必依靠一名小特務呢？

如果這特務是來自修正主義蘇聯那方面的，那麼，此人暗藏了二十年之外，就不是赫魯曉夫派來，而是斯大林派來的了。當時，中蘇關係如兄如弟，老大哥一開口，小弟就無保留的奉告，小小石油秘密，何必派一個人，隱藏二十年之久呢？

其次，是常識問題，發現石油是影片的癥結，而石油卻不是像那特務所想的那樣，從井下取出的原泥中有幾塊貝殼的化石，就證明有石油的存在。石油雖然是由古生物的屍體形成，但石油是流動的，哪個地方發現貝殼化石，只能說明哪個地方曾經有過石油罷了。

再其次，就是劇中人物問題。特務總該是有點本事的。但是這個特務，是一個既無頭腦，又無體力的草包，拿着刺刀卻敗在兩個手無寸鐵的小孩子手上。如果不是把特務寫得太低能就是把那兩個小孩拔得太高。那不正是高、大、全的典型作品麼？

上頭卻一定要改，說要改得比較合理一點就算了。這樣磨來磨去幾星期。最後，我索性提出了我完全不熟悉海島生活和石油的問題，引用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深

入生活，才可以進入創作。」寫了一封信給省文藝辦公室，把這任務推卻了。（《小螺號》後來是原裝上映的呢。）

臨走的時候，領導人對我說：「你要明白我們的八個樣板戲對外國還是發生影響力的。最近，有一位外國著名的舞蹈家還專程來看我們的樣板戲《紅色娘子軍》，讚揚我們搞得不錯，不過拳頭太多就是了。」

我說：「是的，人的許多手勢，是比拳頭要好看的。」

我一個小戲也沒有寫，後來也聽不到多少新的小戲在廣州交易會上演出。如果演出，我想，也是打出去的小拳頭吧。

4 下放的下放

二十二　下放的下放

我又回到幹校來了。

有一天，一連的領導對我說：「組織上給你一個很好的鍛煉機會，讓你參加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到附近的農村上菱塘去。這是很特殊的，每連只派一兩個人，我們一連就是你一個呢。一定要聽黨的話，把工作搞好。」

聽起來，該是受寵若驚才是。但是這時我已到了忘我的程度了。我懶得費精神去琢磨他的話。這位領導是上級從我們這批幹部中選用的。他說的話常常不可理解。他擔任一連的黨支部書記之後，便慨嘆說：「真可惜，第一連沒有幹部，害得我工作得很苦。」幹校沒有幹部，天曉得！

後來，他對我說的話也一樣沒有真實性。事實是下面農村生活比幹校更苦，人們都叫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是「下放的下放」。「九淵之下，尚有天衢」，既然選上，那就去他的吧。

這裏我得補述一下我們這個幹校和當地農民的關係。

我們住的原監獄的土地是從農民手上徵收得來的。既然要徵用，就要補償農民的損失。當時，便

安排農村勞動力參加管理茶場，每人每月工薪三數十元，而他們丟下的土地便派勞改犯人給他們按時耕種，由他們坐享其成。農民很少過着按月領工資生活，因此他們生活也頗過得去了。自從這監獄改作幹校，他們回到自己農村勞動，既沒工資，又要勞動，而那裏土地貧瘠，耕作落後，人們便吃着一頓稠、一頓稀的過活。有時許多天都沒有乾飯吃，他們對幹校的仇視可想而知了。

在這些鄰近農村中，對幹校最有敵意的是上菱塘。因為幹校這地方，本來就是他們的土地。我們用尼龍育秧，第一天紮好，第二天就不見了；茶籽熟了，我們還沒有來得及採摘，就忽然被摘光了。我們種的菜，有時甚至也被連根拔去。對此，我們都不敢吭一聲。

但是，上級偏偏組織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把幹部派到那裏去。上級這樣做，他們是無法拒絕的。誰敢杯葛毛澤東思想呢？

不過，農民自有他們的杯葛方法。有一次，幹校派了一位粵劇女演員去蹲點。剛巧那天她有事不勞動。農民就說：「根據毛澤東思想，不勞動者不得食。」不給她吃飯。幾次以後，她只好捲起包袱走了。

而最近，英德縣領導全縣農民學大寨，進行政治

評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余同志對上菱塘農民佈置討論。一個農民問他說：「政治掛帥，政治好的報酬就要高是不是？」余同志點頭稱是。那農民又說：「你們這些臭知識份子是下來向我們貧下中農學習的，是不是？」余同志也只好點頭稱是。那農民就說：「那麼，你們的政治肯定是不如我們。可是，為甚麼你們的工資那麼高，而我們卻吃不飽？」余同志這時無言以對。那人說：「好，你把這問題回答清楚了，我們再來政治評分吧。」

政治評分推不下去，余同志被迫派回幹校來。我是在這種情況下面去頂替他的。然而，上級對此一點不提，只是冠冕堂皇地說給我一個鍛煉的機會！

二十三　群眾運動與運動群眾

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的三大法寶之一。否則，一個政黨怎能在十億人口的大國裏贏得民心，取得勝利呢？

但是，運動群眾與群眾路線恰恰是背道而馳的。

而我，卻以一個被運動的群眾的身份去做運動群眾的事，其結果是可以預知的。

上菱塘是甚麼樣的生產隊？他們告訴我，全英德

最窮最落後的公社是橫石塘公社，全公社最落後的大隊是橫石塘大隊，全橫石塘大隊最落後的就是上菱塘生產隊了，也可以說這是全英德最落後的生產隊了。

落後在哪裏？在於隊的生產低，覺悟也低，隊裏大部分社員都是超支戶。何謂超支戶？就是全家辛辛苦苦一年到頭勞動，得來的工分，仍不夠購買全家的糧食，還得拿錢去買糧食。這聽來似乎很不合理，但當時在中國農村的廣闊天地內，這樣的超支戶很多。山西大寨過去也有許多超支戶，但由於大寨的農民政治覺悟高，艱苦奮鬥，最後就擺脫了窮困，成為全國農村學習的榜樣。它的領導人陳永貴就成了國務院的副總理了。全國各地都有組織地到大寨參觀，那是一項光榮的使命。上菱塘也有一位農民黨員去參觀哩。

全國的農民都是按勞取酬，做多少就記多少工分的。但是大寨認為那樣不夠高風格，做工不必評分，只要看看那個人的政治態度怎樣，就評他值多少工分就行了。但是到了上菱塘，這樣就是不行！

在黨的領導下，理解的也得執行，不理解的也得執行。我在龍華大隊時，龍華大隊也在執行政治評分。我只記得那時引起了許多矛盾，許多社員大吵大鬧。不過最後終於貫徹了。不這樣，大隊就無法成為先進大隊的。

既然面對着大難題，我不得不硬着頭皮去解決。我的馬列主義修養根本就不高，這時不得不再從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中求救。我記得馬克思從來沒有說過腦力勞動的報酬要比體力勞動的低。他還舉醫生這職業為例。他曾說一個醫生曾花去大量學費，大多時間去學醫，他的報酬自然比一個工人高。而這時我再回憶恩格斯的《反杜林論》，他從歷史的發展來看，人類有了分工就是不平等的開始。他們都是這樣承認差別的。

好了，我就對農民說：我們之間是有着差別，許是不合理的，但也是無可避免的。紅線女曾在我們幹校，現在上頭不就把她接回去，自己唱戲還去訓練別人唱戲哩。你們要她天天下田就不要聽戲啦！為甚麼你們寧可花錢買較貴的戲票呢？幹校裏有不少醫生，你們要他們天天下田，你們病了誰來醫呢？幹校裏有不少的老師，都種地去了誰來教學生呢？你們不是都要把子女送上學嗎？所以，差別是有的，最後，還是應該感謝黨，現在正逐步減少差別，要不，為甚麼要我們都下來呢？

我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似乎得到了農民的認可了。認可的第一步只是同意討論政治評分這工作，可是，並非就同意政治評分。反正他們肯接納我，讓我

在他們那裏工作和學習。

凡事得反求諸己，姑不說這裏的農民和大寨的農民、龍華的農民有多大的差距，先找找運動他們的領導者的差距吧。大寨的領導者是中央首長們，龍華大隊的領導者是威望極高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而我呢，不過是來接受貧下中農教育的臭老九，有多少能量去運動農民呢！

將勤補拙，我只有將辛勤為農民服務以彌補我的威信的不足。在勞動中我拚死拚活的爭挑重擔。農民有病的，小的給藥，大的送到醫院。我們之間的感情慢慢建立起來了。

那位去過大寨參觀的農民，是一個黨員，也是全隊中威望較高的。我進村頭一天，就拜訪他。他毫不客氣的饗我以閉門羹。後來他的小兒子的腳長了瘡，我背他到十多里外的縣醫院看病，發現竟是蜂窩組織炎，幸虧發現得早。這時，他對我比較友好了。他對我進行了友好的、坦率的談話，一共有兩點：

第一點，他說，我知道你急於發動我們學大寨，因此想知道我參觀大寨取來的經。我就告訴你從來沒有人說過的話吧。一是大寨不是種水稻的，二是大寨人生活不見得怎樣好而工作卻比我們辛苦十分。三是，大寨人是不跟我們直接談話的。

第二點呢，他説，「我得警告你，凡是上面派來的工作隊到這裏都沒有好下場的。這點請你記住！」

老實説，我住下來已心滿意足，哪有時間想到下場呢？

二十四　劉少奇路線

同是被運動的群眾，我苦苦的懷念着龍華大隊。

我想，調動着龍華農民的積極性的是一種光榮感，也許，我就用光榮感來啟發上菱塘的農民吧。

上菱塘，在任何時間，都是甘居榜末的。

開耕，它是全縣最遲的，舉凡播種、插秧、中耕、收割，總是在全縣之後，三催四追，總不肯趕上大伙。每次都捱縣裏點名。每次插秧和收割都等幹校來幫忙收拾殘局。我來了之後，幹校的領導説：「你就想想辦法去改變這個生產隊的面貌，這一造別叫我們幹校幫忙插秧，我們幹校已經夠忙了。」

於是，我就和農民開了一個討論會。提出了：老是被上頭批評落後怎麼辦？

問題一提出，一個農民便應我：「你剛來，便看見我們甚麼都落後，甚麼都被點名。其實，過去我們卻是全縣的第一名，常常受到表揚的。」

會場上紛紛響應，細數他們的光榮史。

我說：「那麼，為甚麼那時就那麼先進呢？」

他大聲歎了一口氣，說：「就是劉少奇的路線嘛！」

我按住了驚訝之情，裝做客觀地問：「為甚麼就是劉少奇路線？」

他們說：「這很簡單：按勞動取工分。在田頭派竹籤記數，多勞多得就是了。但是，後來，來了甚麼政治掛帥，打倒了劉少奇路線，就落後啦！」

這樣赤裸裸的話是自文化大革命以來第一次聽見的。

其實，多勞多得，派竹籤記數，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在解放軍領導的四清運動中，就視為落後，不斷努力說服農民不要斤斤計較工分，實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不過，還不至於強制執行而已。

心裏懷念着劉少奇的人，還要談甚麼光榮感呢！

次天，縣裏開大會，縣委書記親自到田頭動員插秧，還肯定地說：「一切都要政治掛帥。凡是用派竹籤這方法的，就是資本主義、修正主義。」

次天，我們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佈置工作，隊長一再強調及時完成插秧，又強調縣委書記這句話。各隊員都做了保證。

最後，宣傳隊長單獨問我：「你們上菱塘這次能不拖大隊的後腿嗎？」

我說：「這得問上菱塘的農民。他們說要派竹籤才行。」

隊長看了我一眼，說：「那麼，你就做農民的尾巴嗎？要實行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嗎？」

我說：「資本主義的代表是美國，美國種田派不派竹籤我不清楚；修正主義的代表是蘇聯，在小說裏我也沒有看過他們派竹籤。而上菱塘的農民卻叫我問縣裏究竟整風整社的六十條還頂不頂用。社會主義按勞取酬的原則還要不要？你教我怎麼去回答他們呢？」

隊長一時吃驚了，他說：「你們上菱塘的農民真調皮。他們有參加政治討論嗎？他們說過些甚麼話？你都得匯報。」

我說：「有的，有一次，隊裏一個農民問我：『趙紫陽被派到內蒙古做書記，是不是？』我說：『是的。』他又說：『那麼趙紫陽不是走資派麼？』我解釋說：『過去是的，人難免犯錯誤，但是趙紫陽過去的功勞是很大的。』這人馬上哼了一聲，說：『哼，功勞大！誰能比劉少奇的功勞更大呢！』

「又一次，有一個農民向我提問：『毛主席說要

文鬥不要武鬥是不是？』我說：『是的。』那人馬上又說：『那麼，為甚麼江青又說要文攻武衛呢？……』」

隊長的臉馬上嚴肅起來說：「你聽到這些反動言論不予駁斥，那麼自由主義嗎？」

我說：「現在我不就是來匯報，請示你該怎樣去駁斥他們嗎？」我看見隊長沒有再說甚麼，便問他：「那麼派竹籤的事怎麼說？回去就得插秧了。」

他說：「那你就瞧着幹吧，以後他們說些甚麼話你都來給我匯報，等我好向上面交代。」

我說：「是的，不過，他們都是貧下中農。」（貧下中農都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呢。）

我們的隊長是一個轉業軍人，說起話來頗為虎虎有威風。可是，我卻覺得我越來越像好兵帥克了。

插秧勝利完成，第一次上菱塘不須幹校來助耕，也是幾年來第一次不居榜末，這是我尊重貧下中農的結果。

但不久，隊長通知我，公安局說上菱塘有暗藏反革命，叫我留意，把一張嫌疑份子的名單交給我。不過，他們又說，他們早在注意了，叫我千萬別驚動他們。

天！

二十五　逆耳之言

過去，我曾經有過一個念頭，要寫一部農村的公社史。因為五十年代起，為了實踐長期地、無條件地深入生活，我在農村的時間可不少。特別是在運動中，常常帶着一些任務下去，和農民三同——同食、同住、同勞動。自以為比較能與農民打成一片，也比較了解農民。往往離開農村之時，如土改，如整風整社，農民也有揮淚依依不捨的。而我所聽到的農民的話，都非常順耳。

但是這次下放的下放，才使我聽到了不少逆耳之言。也使我對過去的看法重新檢討。不只是對農民的，也是對自己的，更重要是對上頭的。

文化大革命中特別強調聽黨話，所謂有令即行，有禁即止。或簡眩為「令行禁止」，以示這提法已深入人心。其實強迫命令，就不一定深入人心的。

在這一段學大寨的時間裏，令和禁都特別多。而我碰着的這班農民，偏偏是「令不行，禁不止」的。起初我頗為着惱。然而聽一聽這些逆耳之言，卻未必沒有道理的。

比如有一次上頭介紹了一個生產隊的經驗，為了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衛生路線，全隊上山採藥。公社就

發號施令，來一個「萬民上山採藥日」。我到生產隊裏一傳達，生產隊長就說：「明天就派兩個老太婆——三級勞動力上山採藥吧。」

我嚇了一跳，說：「為甚麼只派兩個三級勞動力呢？」

他說：「下了幾天雨，今天天剛放晴，地不整就甚麼都完了。番薯能不種嗎？水稻的蟲能不殺嗎？除非那個隊長是神經病的，就甚麼都停下來都不幹而去採藥。」

我說：「可是採藥是執行毛主席的路線啊！」

他笑了。他說：「我們的草藥滿山滿野都是。放在那裏比家裏還好。每人採兩擔，哪一家有這麼多地來放呢？隊裏更沒地方呀。」

我才覺得上頭決定真的有點滑稽，但是我說不出來。隊長說：「我知道你的難處，你向上頭匯報時就說全民出動好了。……」這樣，我只好向這位貧下中農領導學習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夏收夏種忙了一陣，縣裏來了指示，為了爭取晚造增產，全縣推行「番抄早造稻種」。甚麼叫番抄早造種子呢？下種子一貫以來有一個規律，早造用早造收成的稻穀的做種子，晚造用晚造收成的稻穀做種子。這是祖宗十八代得出來的經

驗。現在一切都需要革命了，就要反其道而行之，要用早造收成的稻子在晚造播稻，據說這樣是能豐產的。我把指示傳達給生產隊長。隊長淡然說：「種它三五畝田試試吧。」我說：「怎麼？這不是叫你種試驗田，而是雷厲風行的，還要每個生產隊上報，至少得種百分之七十呢。」隊長說：「得了！得了！如果這造種得好，下造我們再百分之一百吧？」我說：「你怎麼跟上級開這個玩笑？他們要求聞風而動的。」

隊長於是一本正經的跟我解釋：「種番抄晚造種子，我們也看過了，增產是有的。但是，由於它的種子只適合春夏的天氣，所以在秋冬便多蟲害和病害，而且特別需要肥料，如果只是區區幾畝，我們花人工去伺候它還可以。百分之七十，我們哪有這麼多的人力去噴藥捉蟲呢？即使有人力，又哪有這麼多錢買農藥和肥料呢？即使有那麼多錢買農藥和肥料，縣裏可有這麼多的農藥和肥料供應我們嗎？目前我們需要的小量農藥和肥料，供銷社才給我們不到三分一的指標呢。要是政府能聽聽我們的話，可以問問他們農藥和肥料準備好沒有。還有，到這時才發緊急指示，也得張開眼睛看一看再說。老黃，你敢向縣政府說真話嗎？」

為甚麼他叫政府張開眼睛看看？我猛然省覺了。此時此刻，播種期已過半。播下種與插過秧的田何止五成，要求番抄七成，豈非做夢麼？

隊長說：「你怕填表不好看，就填個百分之二十吧。百分之七十這數字，哪一個生產隊都完成不了。我敢包你過關就是了。」

隊長的逆耳之言，何等在理！隊長敢對我說逆耳之言，我可就不敢對上頭說逆耳之言。

二十六　鬥爭貧下中農

果然不出生產隊長之所料，全橫石塘公社上報「番抄早造種子」的數目，遠遠不能完成指標。

但，卻有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他也不因大勢所趨而過了關。

上報不久，我們即收到緊急通知，到公社參加一個鬥爭大會。我和生產隊的幹部都去了。

這個會的規模很大，那被鬥爭者是一個出身貧農的生產隊長。

自我參加農村工作以來，除了「四清運動」外，鬥爭貧下中農是較罕見的。因為貧下中農出身是一個很有價值的護身符。這次挨鬥的生產隊長的罪名就是

破壞增產，不執行種番抄稻種，外加一個罪狀是鋪張浪費，他在嫁女時擺了一席酒。這位貧農登台了，古銅色的皮膚，開始發白的頭髮，完全是一個長年勞動在田野的農民，他毫無表情地站在台的一旁，在他面前擺着兩個竹籮，一個籮裏有一隻雞和一塊豬肉，一個籮裏是青青的稻子，這就是他的罪證。

大會開始了，縣的領導講了話，公社的幹部講了話。跟着，就把一大疊表格發到下面去，叫大家討論，討論之後再填表，報上播種番抄種子的計劃。

我的鄰隊下菱塘，在那裏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員是廣州樂團的女高音程遠。她憂心忡忡的告訴我：「你看，上頭的決心多大，連這個苦大仇深的老貧農也捱鬥了。可是，我們隊的幹部很頑固，我怎麼說他們，他們只答應種百分之四十。現在該怎麼辦？」

我說：「鬥了他們自己的人，就是讓他們自己受教育的。他們有他們的打算，用不着替他們出主意。」

說着，說着，我們的生產隊已討論過了。也算得雷厲風行吧，用不了幾分鐘，我那隊長就告訴我：「好了，我們填了表了，百分之七十。」

這時，下菱塘那隊也討論過了，程遠一臉的愁雲都散了去，笑嘻嘻的告訴我：「農民一說就通了，他們報

的是百分之八十，比你們隊還多了百分之十呢！」

這時，我們的隊長哈哈的笑起來，笑得這位女高音有點莫名其妙。

散會了，我和程遠一道走。

程遠很誠懇的問我：「看來，你那隊長和你挺合得來，你為甚麼不叫他多播些呢？」

我說：「大概你看見他剛才跟我咬耳朵吧。你猜他說甚麼？」

「甚麼？」

「他說，下菱塘報要播百分之八十，其實他們已播了晚造種百分之八十才真呢。都擺在那裏的。程同志為甚麼不問問他們百分之八十的地在哪裏。」

程遠驚訝地說：「這樣嗎？縣裏剛才不是說，播下了的晚造稻種都要鏟起來嗎？」

我也誠懇地說：「要鏟起生長着的秧，那才真是破壞生產啊！他們都在說謊，你裝做不知道就是了。我們天天迫他們，他們只好天天騙我們了。這是關係着他們吃飯活命的事，他們知道的比我們多。」

這時，我們工作隊的隊長來了。他滿臉高興，若有所得的對我說：「這次鬥爭會威力真大，連你們上菱塘也聞風而動了。」

我說：「可不是，這完全是他們主動的，我根本

是按照放手發動群眾的原則辦事的。」

我又一次做了好兵帥克。

二十七　抓人頭

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任務是：鬥、批、改，又提出了「八億人民都是批判家」，革命大批判的浪潮，無處不及，其特點就是把批判對象無限上綱，大扣帽子。

記得我第一次派回廣州寫作時，當時的「文教辦公室」就成立了一個大批判小組。有一批秀才在那裏炮製一篇又一篇文章，批判一篇比一篇嚴厲。舉個例子來說，歐陽山寫的《一代風流》，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這本作品只是被評為有小資產階級思想而已，後來進而升級為宣揚資產階級思想；到了陶鑄被揪出來，又被評為給陶鑄樹碑立傳的大毒草，而到了後來，又提高到歌頌錯誤路線的作品——因為一九二七年的廣州起義此時已被劃為錯誤路線，至此，全部作品都否定了。

既然八億人民都是批判家，這大批判的課程也就到了農民頭上。不久，陳伯達揪出來了，我們便奉命在農民中掀起批判陳伯達的高潮。陳伯達一直以批判

別人見稱，是文革中大批判的帶頭人。這一次受到億萬人的批判，本來是一件痛快的事。但是在農民中如要批判陳伯達，就得先學習陳伯達思想。農民誰知道陳伯達是誰呢？而最令我頭痛的是，這次不但要口頭匯報，還要出版牆報。白紙黑字，顯示出農民之中有梁效型的大批判家。

上菱塘識字的農民根本不多，要他們批判陳伯達的黑六論，談何容易！陳伯達的黑六論到現在我都忘了四論了。但就是開頭那二黑——先驗論和唯生產力論，聽來雖深奧，如結合實際，未始不可以展開討論，不過未免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了。

我一說到先驗論就是沒有實踐根據的主觀臆測，農民的話就多了。大躍進的小株密植，全民出動的大殺麻雀，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之類，把批陳批到三面紅旗上面來了。我引導他們不談過去，說說目前吧。農民忽然面有得色。聽聽他們的高見，卻是因這次種晚稻不受先驗論的影響，不大量搞番抄種子，如今損失比別的隊較輕云云。

說到「唯生產力論」，我舉了蘇修的「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為例證。但是農民就反駁了：那麼我們這裏不是「紅旗上天，番薯落肚」嗎？

看來發動寫大批判文章不那麼容易了。隊裏只有

一個小學老師，其他人不是文盲就是半文盲，她給我出了一個妙計，從正面議論出題目，組織文章。結果弄來弄去，也只弄出了兩篇。一篇是：用實際經驗指導生產，另一篇是「我隊如何抓革命、促生產」。

突然，工作隊長來了電話，縣委要這次的大批判大評比。他親自帶公社的人來巡視。

我跟着隊伍去巡視。別的隊的牆報可真出色之至。除了裝飾的花邊五花八門，引人注目之外，牆上的批判文章名詞多多，派頭十足。到了我這隊裏，簡單的木板上只登着兩篇文章。隊長十分不高興，滿臉晦氣，埋怨我不給他爭氣。我分辯說：「別的隊形式美觀，因為工作隊都是美協、粵劇美工、電影美工，我確沒有這個本事。不過版面和文章都是農民親自動手，我只能發動到此為止了。我是講實際的。」隊長忽而改變了態度，親切的撫着我的背說：「老黃，你是作協的，我寄希望於你很大。你要爭爭氣，就算是包辦，就這麼一次吧，三天後縣就來檢查了。」

檢查組走了之後，那位民辦老師對我說：「隊長叫我們不要執輸吧。我早說過，連題目也不能執輸。比如『抓革命促生產』就太一般化了。我的學生寫文章，種菜的會寫：抓人頭不抓菜頭；養雞的會寫：抓人頭不抓雞頭；種田的會寫：抓人頭不抓鋤頭。」

種田的人抓人頭不抓鋤頭，多怕人啊！

至於這次我是怎麼樣過了關的，我都記不起來了。

二十八　患難之交（上）

文化大革命期間，把文藝界醜化為大染缸。其實，多少五彩繽紛的顏色都從那裏噴薄而出，風雨過後，還有彩虹高懸在天空呢。

在新結識的「同學」中，最使我難忘的是劉任濤。

有一天，我獨自一人在七連（珠江電影製片廠）的菜地上勞動時，一個人從鄰近的菜地招呼了我一聲：「黃慶雲同志！」

我抬頭一望，一個光着膀子的中年漢子從田頭站立起來。好一個龐然大物，臉上、身上閃着古銅的光輝，黑色的頭髮掩不住那碩大的腦袋，初禿的額頭在太陽下發着光，下巴上髫鬚枒杈，巨大的手腳上泥巴處處。我不知對這尊塑像似的人怎麼招呼。

他說：「我叫劉任濤，和你一起開過會的。」

「哦！」我應了一聲，心裏卻說，我還以為你是天方夜談，神燈裏那個巨人呢？

他繼續自報家門：「我原來是在武漢當眼科醫生的。由於我寫了一個劇本，給田漢看見了，他鼓勵我不

再從醫，專業編寫劇本，真想不到落到今天這日子！」

田漢！這名字使我揪心，他對我的鼓勵還小嗎？我默不作聲。他似乎在埋怨田漢，卻又瞞不住對田漢的懷念。他落得今天的日子！可不知田漢這時也許已歸天了。

於是，我便問他：「你既然懂得醫學，為甚麼不在幹校學做赤腳醫生呢？你不是已經赤了腳嗎？」

他搖頭說：「不！上頭不會給我當赤腳醫生的。我沒有那資格。」

我明白了，他還不是同學，他還是一條「牛」。牛雖赤腳，還不能取得赤腳醫生這光榮的稱號。而我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與「牛」對話，給別人看見，起碼就得檢討立場。

但是誰叫我一開頭就那麼疏於防範？正如西諺所說，一清早起床，就錯用了一條腿走路。既然錯開了步，也只好一直走下去了。於是，我繼續跟他交談，當然談的不是文藝這勞什子，我談的是種菜。他談的是醫眼睛，他說他看見這裏很多農民眼睛看不見東西，心裏很難過。其實，那不是真正的瞎，只是白內障，只要他能給他們輕輕一開刀，馬上就好的。

這次，幸虧沒人看見。

以後，我調到農村裏當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就很

久沒有見他了。

又過了不久，有一次我從七連菜地經過，他又叫住了我。

他高高興興的告訴我他已經「解放」了。許多瞎了眼的農民都來請他開刀，他治愈了不少人。我當然很高興，也要介紹我駐隊的農民到他那裏就醫。

他對我說：「我想過了，像這樣子一個一個的做手術作用還不算大。其實這樣的手術很簡單，要是我能把這手術交給農民自己掌握，那麼今後對他們的作用就大了。你能不能對幹校提個建議，再對公社提個建議，組織一些機靈一些，有一點文化的年青人，辦起這樣的學習班呢？」

我當然是舉起雙手贊成，說我一定跟幹校領導說。這個巨人立刻高興得面露笑容，可是，他又憂心忡忡的說，「現在管幹校行政的是陳遠高，他是比較理解人的。你能不能告訴他，我跟農民做眼科手術，握刀的手要絕對穩定，不能出差錯的。可是，我天天挑水、挑糞，挑射桶，鋤大地，握手術刀時常常抖顫的。能不能給我一點休息的時間呢？」

他說的我都照辦了，陳遠高果然就同意。

不久，在公社所在地橫石塘，衛生院裏撥出了房子，給眼科學習班用。這是一所實驗的學習班，年青

的學員一邊學習，一邊醫人。劉任濤就在那裏指導一切。我走到那裏一看，真叫人從心裏高興。被醫的人固然喜笑洋洋，津津樂道他們如何遇着神醫，使得他們重見天日。那些受了訓練畢業的農村青年，朝氣蓬勃，從來沒有想像過他們那雙拿鋤頭的手，竟然可以拿起手術刀來，而且給自己的鄉親治病。在這些即將重見光明與小小的光明使者的口中，總是離不開「劉醫生」。

我望着目前的劉醫生，他再不赤膊了，重新穿上了中山裝，儼然是一位資深大夫。但我想，他的外衣包裹着的仍然是那位神燈巨人，他有着那麼超凡的，又肯給別人服務的毅力。叫他幹哪一行就幹哪一行。田漢沒有辜負他，他也沒有辜負自己。文藝戰士放下了筆，還是一個戰士，無悔此生！

二十九　患難之交（下）

「四人幫」塌台後，我回到作協工作，劉任濤也回到珠江電影製片廠，官復原職。我們兩家住得很接近，因此他常常到我家來。

這時，我編我的《少年文藝報》，他寫他的電影劇本。他常常拿了寫好的劇本來給我看。總是聽說上

頭拿去看，卻沒有一個開拍。

使我震驚的卻是他的女兒寫的一本稿子《忘卻的美》。他把手稿交給我時，真叫我拍案驚奇。那不算是兒童文學，卻從一個嬰兒的眼中感到世界之美，大自然之美和人類的愛，書裏還有她自己插的圖，十分生動活潑。這位作者不但文筆流麗，幻想新奇，而且有很豐富的生物常識。我愛不釋手，後來介紹到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編輯也極為賞識。

可是，這位心靈美麗的女作者劉血花是怎樣的人呢？在讀大學時，被錯劃為右派，在文化大革命時，她的丈夫給那些被蒙蔽的群眾，在沒有審訊的情況下槍斃了。而最悲慘的是，正當他被五花大綁綑着，頭上插着處決的標籤時，他的十歲的兒子剛從小學放學回家，親眼看着自己的爸爸活活被槍斃，我真不敢想像這個情景。而心靈受了重創的血花，卻還能保持着生存的勇氣，她還在寫作（是業餘的），呼喚着人們記得人生忘卻的美。她的專業是城市建設，她還在創作、製作建議和設計，美化城市環境，美化大自然。

傷痕似乎沒有留在小劉的心上，也沒有留在老劉的心上。

不過，老劉確是逐漸老了。他告訴我幸虧在幹校時腦血管硬化還不嚴重，可以做眼科手術。現在，他

自己的眼睛也看得不大清楚，手也發抖了。

有一次，他來我家，恰巧我的眼睛正在充血，劇痛無比，我正要到醫院去。他給我看看，說：「讓我來試試吧。」他叫我從頭上拔一條頭髮出來交給他。他用這頭髮在我的眼睛上一刮，一粒很小很小的鐵片給刮了出來。我的眼睛就好了。可見他寶刀未老，確也是醫術高明。

後來，他分配了房子，搬到廣州河南赤崗珠江電影製片廠的宿舍去。我也因房子改建，搬到文德路五層的高樓上，彼此的往來就少了。

有一天，他忽然氣喘喘的跑到我住的地方來。我看他已經老態龍鍾，頭禿的更多，頭髮也全白了，連說話也上氣不接下氣。他告訴我，要到湖南各地去調查盲童的數目，做一個挽救盲童的計劃。中國的盲童太多了。他還說到廣州，廣州過去還有盲童學校，後來把盲童學校移作別用。如果不及時恢復，將來連僅存的少數盲童教師也流失了。

看他的樣子，我想起了聖經上耶穌說過的一句話：「我的心是願意做的，我的身體卻太弱了。」他的情況也正如此，看看他那搖搖欲倒的情況，我真擔心他此次出師，能不能凱旋呢。

他自己顯然也擔心到這一點。他說：「我甚麼事

都放得下，可只有一件事求你給我辦一辦。我認識了一位年青女詩人，她現在水果攤上賣水果。她還要養一個女兒，你能不能給她介紹一份職業呢？」

此時此刻，他說話的神情，就恍如臨終託孤一樣，我當然義不容辭，一口答應了。

他走後，我到解放北路的水果攤上拜會了這位女詩人。她就是盧邁，我多方努力，終於讓她以臨時工身份轉到作協來，擔任了編輯工作。

在我認識的許多詩人當中，盧邁確是一個連靈魂都滲透着詩意的詩人。她高中畢業時，本來可以在大城市逗留，為了愛上了一個小伙子，就甚麼都不管，小伙子下放到海南軍墾農場，她就拿起個小提琴，跟着他到天涯海角去，在椰風海雨中生活。幾年之後，小伙子因為落實政策，回到他的老家香港去，就把一個女兒留給她。從此她就在廣州一個四平方尺的床位過活。

盧邁進身文化界，她的詩給人們賞識。可她的浪漫氣息，天真心靈，別人看來卻是傻氣。然而，我們《少年文藝報》的同人對她可真合作無間。我們《少年文藝報》為廣州文教當局主動提出一項服務，調查市內現存的盲童師資和盲童數目。這事盧邁一手承擔下來了。後來在文教戰線有關盲童教育的會議上，我

們《少年文藝報》這項工作受了表揚。我想她也是在劉任濤的精神感召下而努力的。

至於劉任濤自己寫的電影劇本是甚麼內容呢？我記得其中一本，那是一個女護士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殺的故事。這類故事在當時照例是不會批准上演的。劉任濤難道不會想到麼？當電影劇本被拒絕時，我問他，人家提的甚麼意見？他說：「就在自殺這一點上，他們說不真實。我寫的是那女護士穿上了整整齊齊的護士服裝，然後像天使一樣死去的。我一定寫她刻意這樣做，死也不能玷污自己的職業形象呀，這一點我是不能改的。」

我心理微微顫動起來，這個一直全身充滿活力，在任何環境都貢獻出自己的人，難道他也曾想過結束自己的生命麼？他說那是真實。那就是真實啊！

也許因為我是從事兒童文學寫作的人，我只會幻想，而我這一條籐上的幾個知心朋友，也都是生活在幻想中的患難之交，患難也不曾把他們的幻想奪去。這就是：劉任濤、劉血花父女倆！

大染缸裏會噴射出彩虹，黑暗世界的幹校會出現光明的天使！

5 靈魂深處爆發革命

三十　階級鬥爭仍在繼續

終於有一天，幹校又把我召回去了。因為下放的期限已滿，得交給另一些同志來鍛煉了。

回到闊別幾個月的幹校，使我驚訝的是，它的面貌好像全然改變。

首先，使我感到奇怪的，我們第一連正在舉辦一個階級鬥爭展覽會。正如我在序幕時所介紹的，在廣州中山紀念堂曾舉行過的階級鬥爭實物展覽會一樣，時光又倒流了。

我想，當時的階級敵人許多都是從家裏揪出來，又被抄了家，這才有許多搜集出來的東西作罪證。現在幹校的幹部，除了手巾牙刷、床舖被褥及小板凳之外，還有甚麼東西呢？

但是介紹詞卻說這是非常重要的展覽會，要提醒大家階級鬥爭仍在繼續：走資派仍在走，新的反革命分子又在猖狂地活動。

我就不得不認真看看這些展品了。

展品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隸屬於走資派還在走，階級鬥爭還沒有熄滅的主題下的。這些展品都是從「牛棚」那裏搜出來，是那些牛鬼蛇神自用的藥物和補品，一些膏、丹、丸、散，甚至包括了萬金油、

藥酒的一類東西。老朽、弱殘的牛鬼蛇神還要健康長壽，豈非妄想頑抗到底嗎？又有一位有慢性病的名人，認為白開水可以卻病延年，因此長期身上掛着一個銅水壺，下田也掛着，還把這方法介紹給別人，這不是活生生的活命哲學，應予以大批判的麼？

第二部分是隸屬於現行反革命的主題的。這就是最近揪出來的隱藏着的反革命份子李××的罪證。這是這個展覽會的焦點。

罪證共有三件：第一、是從他床上搜出來的幾根竹子。第二、一把剪刀和第三、一枝手電筒。

據說明上寫的：這些竹子是李××在勞動時，從竹林裏弄回來，然後把它們削尖，這就可以把人置諸死地。至於那把剪刀，雖然看來是一把尋常的剪刀，刀上卻刻有一條槽，這就是血槽，插到人體裏，血就從槽裏流出來，是可以致命的。那枝手電筒呢，可載三個電池，照得很遠。有此三者，可以證明李××此人，蓄意逃亡，並有殺人的意圖。

我看了之後，不禁為之震驚起來。這些竹子在幹校場地，無處不在，幹校學員工作期間，也有人砍下一枝來做手杖，也有人砍下幾枝扎成竹帚來打掃，為甚麼忽然變成了殺人武器呢？至於那用三節電池的手電筒，則是幹校最新流行的話題。在幹校夜間走動，

沒有手電筒不行，特別是室內沒有廁所，晚間要到公廁方便，人人都得自備手電筒。李××從廣州買了一枝用三節電池的手電筒回來，曾說過；「上級號召節省，我用這手電筒最省電；我還可以不買電池，只撿人家丟棄的電池，也可利用一段時間呢！」節約竟成了陰謀，恐怕是他始料所不及罷。

至於那剪刀的來歷，又是不少人都清清楚楚的，是他來幹校之前，託一位女同志給他買來。那女同志就在南方大廈百貨公司給他買了一把，到了幹校之後，也有學員跟他借來用。南方大廈是全廣州最大最可靠的百貨公司，買東西只能有啥買啥，誰會注意剪刀上有沒有槽呢？生活工具變成殺人兇器，又是始料不及的吧？

次天，連裏對這李××開了一個鬥爭大會，李××不承認他的罪狀，逐點反駁，我平時對他不太熟識，只覺得他人是隨和的。在鬥爭中，只要他說出買剪刀的過程，證明只是為了實用，沒有殺人的預謀，我想那不就很易為自己脫罪嗎？知情的人有的是，那位給他買剪刀的女同志也在群眾裏面，而當那些主持人喝問他是誰給他買這剪刀時，他忽然低頭不語，一臉無奈的拿不出人證，這樣，他的罪證確鑿，罪無可恕了。

這時，我忽然對他同情起來，他不供出是誰給他買剪刀的，是怕連累別人，寧可自己受罪吧。

過了兩天，晚飯之後，幹校裏忽然宣佈出了一件大事，這天下午收工時，發現李××不見了，幹校派出一些人去找他的下落。直到夜深，才在懸崖下找到他，他跳崖自殺，已奄奄一息了。

不過，李××沒有死，只是折了一條腿。上頭認為這是他罪有應得，私逃不遂才發生這意外的。

他逃甚麼？逃獄！是的，幹校本來就是監獄啊！

(現在，我該在這裏補充一下，幹校解散後，李××也恢復原職，還是一個積極工作的好幹部。

至於那些羅織罪證，無中生有，險些把人置於死地的人們，當然照樣高高在上，關於他們，我就無可奉告了。)

三十一　「靈魂深處爆發革命」

在幹校呆了兩年多，其實我對幹校所知甚少，而且有時還覺得它是有點神秘的。比如，我到農村工作的時候，幹校有時也召我們回去開會。可是，要我們遵守一條規則，不得隨便打聽連隊的事。而幹校牆上貼着的大字報，都不許隨便看。

我不習慣「偷窺」，但卻不能「視而不見」，因為你是無法像瞎子一樣，閉着眼睛走路的。何況牆上那些殺氣騰騰，用紅色交叉塗抹在上面的字，一時是甚麼「五·一六份子」，一時是甚麼「漏網的叛徒」，「隱瞞成份的階級異己份子」等等。向你撲面而來呢，可是我都不敢多看幾眼，總是匆匆而過。

到我完成了農村工作歸來時，牆上也貼滿了大字報，不過內容卻是煥然一新了。我想大概階級敵人——明的暗的、真的假的都被消滅掉了。

可是，革命並不因為敵人人間蒸發而癱瘓下來，反而提高到新的境界，就是每人都在自己的靈魂深處爆發革命，不斷的鬥私批修。

有兩張大字報是受了表揚，到處張貼的。內容大概如下：

一張是〈圍牆為甚麼築歪了？〉寫的人是那個築圍牆的幹校學員。我還以為他一時粗心大意或技術不過關呢。不！原來他說，在建築時忽然頭昏腦脹，叨念着毛主席教導「要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時，忽略了「完全」和「徹底」四個字，於是牆就築得不三不四了。

另一張是：〈為什麼要找支部書記？〉說的是有一天，他和大家在田頭幹活，幹勁十足，把任務提前

完成。在筋疲力竭之餘，他建議去請示黨支部書記，下一步應該怎樣。跟着，他就自我批評說：「這是我有私心雜念的表現。其實，內心深處，我分明想休息一下。要不，為什麼要請示支部書記呢？」

儒家是講究「誅心」的，佛教教人「六根清靜」。可還比不上這玄之又玄的大字報啊。

跟着，我們又遇到一件空前盛事。

原來，我們種的稻穀收成了。校部安排我們到糧站交糧，說這是空前的壯舉，千古以來，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只有吃飯的幹部，哪見過交公糧的幹部？校方為了鄭重其事，幹校學員傾巢而出，人人打着旗號，挑着公糧，大隊人馬，浩浩蕩蕩，到鎮上交糧去。

上級為着照顧幹部的體力，每人挑的擔子非常小巧，小小籮筐，裏面載着的也不過四分之一，甚至有人用洗衣的水桶，搖搖晃晃的挑他半桶，敲鑼打鼓的走到街上。到處說着唱着：如今是自食其力了。有位同志輕輕在我耳邊說：「你看過舊戲沒有？這真像『金生挑盒遊花園』呀。」

說時遲，那時快，忽然，咔嚓一聲，哪一位的擔子斷了繩子，撒了滿地穀子。這是我們的一位老音樂家老Ｙ。他驚惶地停了下來，把稻穀一掬一掬送回筐裏。按常規，農民有這樣半路落過地的穀子是不能進

倉的。不過，糧倉裏的幹部正作好歡迎姿態，一一收下了。

說實話，當時我是絲毫不感動的。我覺得是在演一場戲。我們種出的穀怎麼就能養活自己？我從來沒想過要自己種穀來吃，我沒法想像還要自己織布來穿，自己搭房子來住，這豈不逐漸回到洪荒時代嗎！把這個做掩眼法給農民看也不行，我分明聽到農民在說：「幹校的田下的肥那麼多，簡直就是富農田呢。」何自食其力之有！

但是，送公糧這主題竟成了幹校大字報的主題了。許多人大談送公糧的感受。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那個籮筐斷了繩子的老Y。他的題目是：〈繩子為何斷了？〉別以為他在解釋，他在自我檢討呢。他寫的是：斷了的不是繩子，是我思想中階級鬥爭之弦。」他的檢討十分痛切、深刻。恕我不在這裏把他如何演繹這論點寫出來，我自己也記不起了。總之，那時的文體就是這樣的。而Y同志，是一位很有思想修養，很有文化水平的領導幹部。這就是他下來勞動數年的結果哪。

不過，正在這革命的緊急關頭，那個提倡「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的帶頭人，卻在溫都爾汗上空實行爆破了。

三十二　小洞的故事

同是幹部中，有些人或自命為，或被稱為當然左派。此等人並非有過人之智慧，或極其高尚的人格，最重要的是出身工人或貧農家庭，這是先決的條件；然後，當然是黨性強，立場堅定等等。

機關的人事及機密部門，所有幹部的調查材料及檔案，往往掌握在這些人手裏。政治掛帥，理所當然。

文化革命開始後，我才從農村調回來。據說，廣東四個協會（作家協會、音樂家協會、美術家協會、戲劇家協會）的運動是由一張大字報開始的。寫這張大字報的人是女同志J。她就是美協的人事部門的，而她的大字報就是針對着黃新波，把他打為牛鬼蛇神。而新波被打為牛鬼蛇神之後，在鬥爭台上，她又大力摑新波耳光，威風凜凜。在革命群眾組織中，她又加入了一夥根正苗紅的組織，成為響噹噹的鬥士。她一直掌握了美協的人事部門多年，雖然人到中年，不是紅衛兵，卻威過紅衛兵。

我過去與她不過是點頭之交，文化革命開始後，地位懸殊，竟連點頭也沒有了。這次，四個協會都是被砸爛單位，所有的女幹部便都集中到女宿舍來。她

的床位就在我的對面，一排中最末一個。這時卻沒有誰對她親熱打招呼，冷冷清清縮作一團。原來，在文化大革命清查階級隊伍時，她被揭發，家庭成份不是貧農而是地主，於是，當時得意一條龍，如今成為失意一條蟲了。

這時稻穀剛剛收過，幹校學員閒來無事，把稻桿紮成小掃帚。各人又獨出心裁，在帚柄上織成各種圖案，小巧可愛。我從來喜愛這些小玩意，便拉着同志們，請她們教我如何紮作。

正在這時，J親切地向我招手，把我招呼到她的床邊，把她剛織好的一把小桿掃送給我，一面向我示範，教我編織一些圖案。

我這人從來善於忘懷，看見別人笑臉相迎，同時玩好在耳目之前，就對她毫無芥蒂了。她一邊編着那稻桿掃，一邊娓娓而談。她很神秘的，很信任地告訴我：「你知道林彪在溫都爾汗機毀人亡的經過嗎？」我說：「當然知道，已經傳達了一星期了。」她說：「那麼，你知道是誰發現這陰謀的嗎？」我很奇怪的望着她，傳達時都說得清清楚楚，她還有甚麼獨家新聞呢？她更是意味深沉，更神秘地說：「是毛主席自己發現的。毛主席從一個小洞裏看到了林彪的秘密，就把他揭發了。……」

她的話，後來我咀嚼一番，才恍然大悟。原來文件上有「毛主席洞察一切」這一句，這就是她的演繹了。

我不敢取笑她。與其取笑她無寧憐憫我們自己吧。像她這樣的人，人事、政工部門有的是，可惜只有他們「洞察」我們，而我們無力「洞察」他們就是了。

三十三　我的兒子

一天早上，連隊指導員（其實就是原來作協的同事）忽然把我叫了去，滿臉嚴肅，不動感情地告訴我：「據家屬組反映，你兒子在廣州學得很壞了，叫我通知你。」

他用「學壞」這個詞，因為他熟識我的兒子，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人們總愛在我夫婦倆面前稱讚我的兒子的。壞，該是最近才學來的吧。我問他怎麼壞法呢？他說：「他經常群着幾個幹部兒子回家，聽廣播、洗曬相片。」我一臉迷惘，孩子聚在一起有甚麼奇怪？聽廣播又有甚麼奇怪？廣播不是要人聽的麼？洗曬相片，那是一項有益的活動，有甚麼壞處呢？我不得不提問了：「他聚集了哪些孩子？聽了甚麼廣

播？洗曬了甚麼相片？」他說：「聚集的那些孩子都是調皮的，一個是董大姐的兒子，一個被打倒的公安局長的，長年哮喘的孩子，樓上那孩子（當然是本單位，爸爸被打倒的）。他們常常開收音機，怎麼知道將來不會收聽反動廣播呢？搞了一個黑房曬相，怎知道不會做特務活動呢？」

天哪，那麼大的名堂，我兒子才是個十三歲的孩子哪。

我沒話好說，想來只有自我檢討，我說：「都怪我疏於管教。」

這一句卻觸着他的敏感神經了。他嚴肅地說：「我告訴你，你不能用這事做藉口埋怨幹校，埋怨領導，把你調到茶山來，害得你的兒子變壞……」

我說：「我不埋怨領導，只是在這裏想不出怎樣去教他。」

他想了一想，說：「那麼，我批准你一星期的假期，要把握好這時間，將這件事處理好，不要對組織不滿……」

於是，我就有了回家的題目。

我到幹校之前，把三個女兒和一個兒子作了一下安排，本來她們都住在一個房子裏的。我家在城西，到了晚上，烏燈黑火。而當時學校的活動很多，女兒

們常常需要晚上十一時以後才回家，使人不放心。我的父親是住在市中心的北京路，晚上仍燈火通明，因此我讓三個女兒跟着公公住，而讓兒子一個人住在原來的家裏。

這個家很大，前後有院子，室內一廳三房，後面是廚房，都由兒子一人當戶主。我一走進院子來，樹木零落，一片荒涼，到了室內，撲鼻而來的是一片霉味。我兒子只住了一個房間，其他房間通通關閉着。一個十三歲的孩子不能照顧那麼大的房子。東西會說話，也會對人流淚，書籍都鎖在貼上封條的書櫃裏，牆上掛着的照片都發霉得看不清楚，看見的只是玻璃面流下的水痕了。

我看看兒子，甚麼也沒有兩樣。我便到住樓上那位女同志A家裏訪問。我們的院子只有兩家人。樓上住的一位畫家，夫妻都下放到幹校。其妻便是A同志，也剛從幹校調回廣州，負責家屬組的事。我們兩家一直交情甚篤。她的兒子與我的兒子也是好朋友。A同志為人耿直，高中畢業後參加工作，成了積極份子，向工農兵學習。不知何故，A常以文化低自命，時刻表示立場堅定。她與畫家早時是一雙模範夫妻，畫家被揪出來之後，她十分義憤，當面背面都罵他。甚至畫家從幹校解放出來了，她還非常氣憤，他叫她

也不理不睬。但無論怎樣，A同志是個好人，她心直口快，不如某一種積極份子，會篤人背脊及害人。

我們本來也是老朋友，此刻我問到兒子的事，她表示十分氣憤。她家的一個親戚又在旁邊指手劃腳，訴說這幾個孩子（包括她的兒子在內）如何不是，罪狀之一，是董大姐的孩子買了一枝汽槍，幾個人打過隔壁的貓；罪狀之二，那個道貌岸然的老親戚說，他們都用代號的，誰知他們搞的是甚麼鬼玩意，甚麼反動組織。我問他是甚麼代號，他說，其他不知，我只聽過他們叫你的兒子做「阿伯」。

我心裏暗笑，我的兒子性情內向，不苟言笑，叫他做阿伯，是頗有理由的。朋友間起花名綽號是常見的，何況孩子？幹嗎甚麼都要跟特務掛鈎呢。

A同志看見我的反響不甚理想，她帶着抱怨的神氣說：「你的兒子真的要把我的兒子教壞了，他借了一本壞書給他看。」

「甚麼壞書？」我有點緊張。

她說，一本書，上面有插畫的，畫一個皇帝，把酒放滿一個水池，水池旁邊的樹上又掛滿了肉。

我差點沒笑出來，這是我買給孩子們看的書《中國上古史演義》，這就是商紂王酒池肉林的故事。我暗暗說：「我的好同志，你還不如我的兒子懂的事

多，你過去讀的書去了哪裏了？」

她一直氣憤憤的説下去：「天黑了，我們閂上門，他竟爬牆頭回來。」

我一聽，這倒嚴重了。為甚麼天黑就關門，孩子不爬牆回來那不更嚴重麼？

她是我的好友和芳鄰，我本該好好的跟她談談。但是她理直氣壯的説：「我已把他們的事反映到公安局××辦公室了。我説這裏有一個小集團。他們的名字我都交了上去，已備了案，包括我的兒子在內。」

人家如此「大義滅親」的豪氣，我還有甚麼可説呢？

為了多方面了解我兒子的行徑，我又到兒子念書的中學去。

孩子們讀書以後，我對人民教師特別有好感。以前，他們常常上我家家訪，他們對孩子的注意比家長還仔細。兒子讀二年級時，他的班主任來家，對我説：「你的兒子有內向的傾向的。他不主動舉手回答問題，但是他心裏是明白的。他對老師不主動接近，但是他心裏是對老師敬愛的。我們要注意教導他，我有意安排他表演歌舞。演出時你一定要來看，要給他鼓勵！」何等的細緻，何等的了解她的學生。

這時我到中學去看兒子的班主任，她也是一位女

教師，比較精明的樣子，文革後就在學校站得住的老師都是在風雨中站得住的。主要是他們會看出適當的風向——左。當我問及兒子的情況時，她想了一想，就說：「你要打破他的沉默，要說話。」

我問：「說甚麼話？」

她說：「你兒子絕不會做壞事的，但是，別人做了壞事，他絕不說出來，這是——」

「這是不打小報告？」

「不，這是江湖義氣。比如說：和他同桌的同學是一個頑劣孩子，但是他從沒向我們反映過。」

我苦笑說：「我也沒法，那是他的個性。」

她說：「那麼，以後，請你叫他不要與這人接近。」

我又是哭笑不得，你既把頑皮學生安排在他的身邊，怎麼又要他不接近他？我心癢癢的，很想說：「老師，我也是學教育的，對頑劣的孩子不能抵制和孤立，我們的責任是教好他啊！」

那位老師又說：「還有一位同學張××，我知道他曾到過你家去。這個孩子也不是好人，他穿的衣服是常常熨得光光滑滑的。我懷疑他是偷來的。他能偷衣服也能偷別的東西。他常上你家，會把贓物放在你家的。」

跟着，在她身邊的一位年青老師又在打岔：「最近有些同學參加了早泳，你兒子也有份，值得注意。」

我奇怪地問：「早泳不是學校提倡的麼？鍛煉身體有甚麼不好？」

那位年青老師說：「哦，難道你不知道，許多學生練習游泳是為了『督卒』的（即偷渡的意思）。我對於那些能游過水池幾次的學生都特別注意的。」

訪問至此結束。

我回家了，我決不相信兒子會放贓物及偷渡的事。我只問他那個姓張的同學是不是常來我們家。他說：「有過幾次，有一次他哥哥也來。他哥哥是教書的，他很想看你。」問清楚了，這是我的一個熱心讀者，很想從事文學寫作，還寫過信給我的。

我問這同學是不是常常穿着漂亮的衣服呢？兒子說：「他的衣服也和同學們的一樣，不過都是洗得乾淨，熨得筆挺。因為他家是裁縫，有熨衣服這習慣。」他還說：「班主任因此懷疑他的衣服是偷來的，叫他去問了幾次話，這班主任可怕極了。」

樓上那孩子也來看我這「阿姨」了。他不如我兒子的內向，侃侃而談，說媽媽真是傻瓜，在這樣「沒王管」的環境中，自己的兒子能不參加壞人的集團就

該嘉獎的了，還諸多責怪，可笑極了。因此，我也沒有對他們說甚麼責怪的話，怕他們把我也當傻瓜。

奇怪的卻是，為甚麼慈愛的母親如A同志，她的德高望重的老親戚，中學的班主任和年青的老師，都這麼緊張呢？我想，大概是近來到處放映了一些國產片和阿爾巴尼亞的影片，除了戰爭片就是反間諜片。林彪還說世界上戰爭永遠存在，和平只是戰爭的繼續。難怪人人的階級鬥爭之弦都綳得那麼緊，覺得到處都是螞蟻了。

恰在這時，我的老褓姆八嬸來了。八嬸是把我兒子從小帶到大，文化大革命後才離開我家的。聽了目前的情況，對我說：「你兒子是好的，請放心，還是讓我回到你家來照顧他吧，如此小的年紀。」

須知，當時我們的銀行存款已被凍結（雖然只有三百元），每月工資也扣了好一部分，我是請她不起的，但她絕不計較。她說，現在我是給人家縫衣過活的。我把衣服拿到你家來縫就行了，用不着擔憂。」

事情就這樣圓滿結束了。都虧了這一位出身貧苦而沒有階級鬥爭觀念的老人家。

在我們那個時代，一切都要「以革命的名義」，「兒女私情」是不許存在的。

統治文革歲月的八齣「樣板戲」，除了階級感情

之外，何嘗有「兒女私情」呢？

可就是人們無法把「兒女私情」抹殺。

在幹校的三年過程中，我的家庭被分成兩處。對丈夫呢，除了那次兒子來訪，看見他把兒子當成陌生人，我無法在他面前隱藏自己的眼淚之外，再沒有一次正面碰面。後來，我調到炊事班。因為收工很晚，鍋裏有些許熱水可以用來洗澡。在那九冬十月的嚴寒日子裏，我悄悄的用水桶捎到他要走過的路上，遙遠的指給他去取用，冒着險雪中送炭，如此而已。他是患有哮喘病的，又年近花甲，在家裏風色稍變，也喘不過氣來，我就能獨自的順暢地呼吸嗎？

記得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時，他就悄悄的痛心地對我說：「我看，將來受害者還是我們下一代！」

此時此刻，他能想像到，不須等到將來，目前，我們的下一代已在受罪嗎？

三十四　神秘的房子

應該說，這是後幹校時代了。

我感到空氣開始有點變化，有點鬆弛。

我自己呢，這時候一忽兒安插在炊事班，一忽兒被抽調到幹校的宣傳隊。宣傳隊以表演單位的連隊為

主，如廣州歌舞團、粵劇院、話劇團的單位，我隨着他們，出發到粵北地方，參觀一些先進的工廠和農村，實地向工農大眾學習。

幹校也有時舉行一些演出晚會了。在一個會上，我看了話劇團演出的一場好戲《第五號水牛》。編劇的是話劇團的老作家，根據他們的實際生活編的。

劇情是一個老幹部到幹校來，負責看牛的工作。這位老幹部經過思想改造，在勞動中對耕牛發生了感情。有一隻第五號水牛年老多病，本來該淘汰的了。他卻極力反對把牛送往屠場，千方百計，把牛治好，牛恢復體力，又重新投入工作了。因為有生活基礎，演來相當動人，而且也突出了抓革命、促生產的主題。

但是，演出不久，廣州方面就來了文件，指出這齣戲是借着文藝進行反革命，影射我們的幹校，把成批為人民服務多年的幹部留在茶山，像驅趕老牛進屠場一樣，顯然是一株大毒草。為此，廣州派人來進行調查，好不緊張。最後，因為這是真人真事，才不作追究。可是結論還是階級鬥爭的弦一刻都不能鬆。

有一件事，我始終不大清楚的。我自從調到炊事班後，因為起居時間，跟大伙不同，常常得聽鬧鐘夜半叫起，容易同時吵醒其他的人，於是，為了工

作方便，我的住處也得從大監倉搬到幹校另一端的房子裏。

搬進小單位的第一天，我發現對面有一間很神秘的房子，臨街的木門是鎖上的，而木門的上下兩端都是鋸開了的。這樣，在房子裏面的人不能走出來，而房子裏面的人的一舉一動——包括大小便，外面都能看得清楚。木門對面的走廊上，有兩個五．七戰士，一副威風凜凜的臉孔，挺直腰板，坐在椅子上。椅上兩邊，各放着一根粗木棍。到了一定時候，就打開木門，一左一右，押着裏面的那個漢子，挑起木桶，到外面的廁所進行打掃。

我最初看到這小房子的時候，心裏有點納悶，裏面拘禁着的是甚麼人，為甚麼要勞煩五．七戰士去把守呢？到這個人一露面，我就更吃驚了，原來那人也是一個五．七戰士。他比較年輕，和我不同一個連隊，可是我認識他。有一次在圖書館，他虛心的向我請教些甚麼。後來我下鄉時，又看到他表演戲劇，好一個意氣風發的樣子。到了幹校之後，風聞他寫了不少質問中央文革小組的大字報，拒不接受批評。現在為甚麼要關在這裏，受這樣的待遇，我們幹校可不是專政機關呀。

這房子是在一條小通道上。只有小量行人經過，

不過小學生倒不少，因為他們要取道這裏到學校上課的。這些農村孩子往往都用好奇的眼光看着這房子，還竊竊私議：「是不是這裏又要變回監倉呢？」「現在的監倉是這樣的嗎？」但是他們一抬起頭，看見那兩尊殺氣騰騰的看守者，便不敢多看，匆匆走過。我呢，雖然我也認識這兩個看守人，也不多問了。

過了一個時期，這小囚室人去樓空了，也有傳說樓中人已人間蒸發了。

總之，乍暖還寒，就是後幹校的情況。

三十五　專政迷——尾聲

人生的舞台沒有帷幕，誰也不輕易預見一幕戲在哪裏開頭，在哪裏結尾。

不過，五・七幹校快要落下帷幕的氣氛已經籠罩着我們了。

軍宣隊領導不斷的吹風，幹校就是幹校，有學習便有畢業，思想改造得愈好的，愈快畢業，愈快派出工作，「死在茶山」這喪調不再彈了。除了比喻為學校外，幹校又被喻為人才的倉庫。人人是貨品，只等待着提取。多謝抬舉——我們都成為人才了。

果然，不久，幹校就選出了第一批人才，當然是

響噹噹的精英份子，奔赴全省各地，走馬上任，還開了盛大的歡送會，以鼓舞行者，以教育滯留者。

去了一批又一批，去的很多，留的仍是不少。領導坦率地說：「並不是我硬把你們留在此地，總得有人要接受才行啊！」

我久矣乎沒有計較這些毀譽和得失，和許多幹部一樣，忠心耿耿，把自己當成是擰在那革命大機器上的一顆微不足道的小螺絲釘。但此時聽了這樣的話，感情卻真的傷透，你不怕隱形，卻被當成生銹的廢鐵那樣，可是銹在哪裏呢？

直到了很久很久，為了慶祝毛主席「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的三十周年，文藝又提到議程上來了，廣東的文藝辦公室廣泛向工農兵徵文，辦起了《廣東文藝》雜誌。徵文要人評選，雜誌要人編輯，我才被調回廣州。

我投筆從農多年，又在幹校學習了三年，便有一個感覺，人是可以和文藝永不沾邊的，沒有文藝，人們可以一樣生存，地球可以一樣運轉的。到我回到文藝的工作崗位上時，才知道大謬不然。群眾對文藝的熱愛，簡直出人意外，只要得到一本遭禁閱或是被視為大毒草的文學小說（那時差不多全數都是），就緊密收藏，暗中傳閱，不斷撫摩，沒有幾

頁書不是像炒過的魷魚一樣捲了邊的，秘密閱讀之後還秘密創作呢。

大眾的創作的熱情，更是我們想像不到的。他們不為名，不為利，（那時早就沒有稿酬了）。也不怕因寫作而得禍，那怕工作繁忙，仍孜孜不倦的寫。有一個農民，家無長物，也把唯一能換錢的雞蛋拿到墟上出賣，然後買來了稿紙、墨水、筆和燈油，每到更深夜靜，過了供電時間，電燈不亮，還在一燈如豆的情況下寫作。也有少數作者，為了寫作，和老婆鬧翻。有這樣的作者支持，我們徵集文章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當然不那麼難了。

同時，另一方面，地方領導幹部也都以他們的子民能在省級刊物發表文章為榮。如果是反映當地的新人新事的，那就是難得的政治本錢，因此，我們每到縣裏徵集作品時，都受到當地的歡迎。臭老九如今能成為伯樂，又可起橋樑的作用，當然是今非昔比了。

有一次，我下到某縣的文化局聯繫工作時，局長忽然問我：「這裏有一位從你們幹校派來的T同志，工作得不很愉快，你們能不能給他做做思想工作呢？」

我一問，原來這位T同志就是當年拿着棍子，看守着木門內的囚犯中的一個人。他就是第一批從幹校

畢業，派到這裏來工作的。

局長告訴我，當他下車伊始時，曾經風頭火勢，說他分配到這裏是為着加強無產階級專政而來的。

但是，這裏是文化崗位，能有多少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職位呢？局長考慮一番，就安排他專管分配戲院戲票的工作。那時，戲劇演出，往往招待一些領導幹部到場。甚麼人坐甚麼樣的位，從前座、中座到後座，從左邊、中間到右邊，從第一排到最後一排，都有個先後、輕重、貴賤的分別，確是一門特殊的專業。T起初還有點為他的特權而沾沾自喜。日子長了，他就不滿足於只是管治這幾十行板凳了。他屢次向領導提出要求調升，但領導也想不出有甚麼職位更適合他。他因此而愈來愈自閉。甚麼人——包括自己的女朋友也不見面了。連窗門都關得嚴嚴的，人們把他的家指給我看，玻璃窗後面就是黑色的布。

這不由我不想到幹校那個小囚室。

文化局長問我可要見他一面麼？

我說：「不用了，他未必願意見我，我也沒有必要見他。」

吐絲自縛的蟲子，還是等他自己破繭而出的好！

至此，我這回憶錄也得收筆了。因為我們這些老

九們都淡出幹校這舞台了。幹校悠長的三年，遠不是這區區的數萬字可以概括。這只是巨大海嘯過後的幾點水斑。一般的水斑可以擦去，攙和着眼淚的水斑永遠留在人們的記憶裏，點點滴滴在心頭的！留住淚痕是為着不要再有淚，我想，人類終於能征服海嘯的！

這本小冊子，是文化大革命中我在五・七幹校三年的實錄。這長長的三年，就是我把五・七幹校的牢底坐穿的日子。我敢告訴你，這裏說的全是事實。每一個字，甚至每一個標點符號都是真實的。

我接觸不少年青人，他們對文化大革命已愈來愈陌生，更遑論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五・七幹校呢？

文化大革命四十年了，幹校悠長的三年，遠不是這區區的數萬字可以概括。這只是巨大海嘯過後的幾點水斑。巴金曾莊嚴地提出建立一個文化大革命博物館，到現在，連文化大革命博物館的建議者巴金也逝世了，他所期待的博物館也許會隨風而逝。我不能等到它放下第一塊奠基的石頭那一天，只好將那三年的回憶講述出來。當人們回顧那一段慘痛的日子時，這些回憶能夠成為細碎的磚瓦，放到人們想念中的博物館裏面，起着凝聚教訓，啟迪反思的一點點的作用，那我就感到滿足了。

黃慶雲（雲姊姊），一九三九年國立中山大學畢業，四八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碩士學位。一生以寫作、編輯、教授及翻譯兒童文學為主要工作。三八年開始發表作品，最早主編的《新兒童半月刊》在香港出版，面向大陸、港澳及東南亞小讀者，成為深受讀者喜愛的雲姊姊。八十年代起，她曾多次出席日本、美國、法國、瑞士、墨西哥、委內瑞拉和韓國的文學及兒童文學會議。主要作品有《媽媽，我很醜嗎？》《肥國王》《埋藏了的陽光》《月亮的女兒》《金色童年》《花兒朵朵開》《童年的花園》系列等等，部分作品被譯為英、法、日、西班牙文，作品曾多次獲獎。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牛津大學出版社
www.oupchina.com.hk

ISBN 0-19-596496-9
9 780195 964967